

### 第三章 大紀元專訪文章精粹

## 前 言

被長期軟禁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於北京時間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早晨病逝，趙紫陽的去世，在海內外華人中引起巨大悲痛。海外包括香港都掀起了悼念趙紫陽的高潮。但中共卻刻意對大陸民眾隱瞞消息，深恐此事對其不穩定政權造成威脅。

在經過與家屬十多天的拉鋸戰談判之後，在海內外的強大壓力下，中共以欺騙和高壓手段，促使趙家子女同意進行遺體告別。遺體告別儀式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新華社簡要報導了趙紫陽的生平，隻字未提趙曾擔任國務院總理、黨總書記，以及他在改革開放中的重大貢獻，卻特別指出趙在一九八九年「犯了嚴重錯誤」。

大紀元記者在這十多天當中，秉持新聞記者的正義良知和還公眾知情權、還歷史真相的目的，不辭辛苦，採訪了幾十位包括趙紫陽前智囊、前中共高層官員、知識分子、民運人士及普通老百姓，從各個角度報導了趙紫陽的病逝給各界人士帶來的震動和反思。以下是十多篇專訪精粹。

## 趙紫陽家人：人民會公正評價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病逝後，在海內外一片哀悼、呼籲聲中，趙紫陽的家人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大紀元記者辛菲北京時間一月二十七日晚和二十八日早晨先後聯繫到了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原名趙亮）、女婿王志華夫婦。他們證實了趙紫陽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將在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舉行。從記者採訪中可以看出，目前趙紫陽家人仍然受到中共當局的嚴密監控。

王雁南夫婦對海外各界人士的關心表示感謝。他們表示，他們家人對評價這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見，但主要是基於對父親的感情問題，希望父親盡早安息。鑒於國內的情況，所以他們也就同意了遺體告別儀式。但這並不代表趙家同意中共當局的意見，而且他們一直在堅持他們的意見，他們認為趙紫陽先生在老百姓心目中早就有評價了，歷史最終也一定會給出很公正的評價的。

王雁南夫婦表示，由於整個遺體告別儀式是中共當局辦的，他們對當局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會說什麼、以及最後是否會發公告、哪個單位發、什麼內容都不清楚。至於誰能參加遺體告別儀式，都是由組織者決定的，他們也不太清楚，但他們家人希望鮑彤先生能去參加。他們表示，趙紫陽先生肯定不會葬在八寶山前國家領導人所葬之地。

### 採訪王雁南

記者：海外的各方人士對趙紫陽先生的事情都非常關注，呼

籲聲很大，大家還都抱著希望，希望能夠給趙紫陽先生一個公正的評價，但是聽說現在情況不太樂觀？

王雁南女士說：海外各界人士的關心和想法，我很感謝，而且我們的家人和我都認為評價這件事情在老百姓心中和在歷史上會有公正評價的，這個我們並不擔心。老百姓心目中早就有評價了，歷史最終也一定會給出一個公正的評價。鑒於現實的各種情況，我們就不方便說什麼，或者不方便怎麼樣，我們不方便告訴你們我們怎麼想。

記者：但是也許大家一起努力，堅持下去，會有一個好的結果。有些人說現在其實也是一個正邪較量的時候，大家的力量聯合起來肯定會起作用的。

王雁南：我想我能說的是，感謝你，也通過你感謝關心我們的朋友。我們是有不同意見，並不代表我們同意他們的意見，但是主要是基於對父親的感情問題，我們還是希望他盡早安息。而且我剛才講了，這件事情自然會、早晚會有評價的，而且評價也在心中，並不是說要他們現在給出個什麼評價來，他們不可能。總之，我也不能給你多說了。看樣子，你也是很久沒在中國生活過了。

記者：大家也在說中共方面其實是很害怕的，大家都和你們站在一起的。最後時刻最關鍵，也許大家一起再堅持一下就會有個好結局呢？

王雁南：謝謝你們的鼓勵和支持，我想我們對這裏的情況更瞭解一點。包括其他的人，我們都很感謝。

今天我能你給你講這麼長時間的話，居然沒有斷線，我已經

很吃驚了。

### 採訪王志華

記者問：聽說趙紫陽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在星期六，但沒有追悼會。

王志華先生說：是的。

記者：不知這個決定是在壓力下被迫的還是自願的？

王志華：我想這個是搞一個送別儀式，這個我們沒有覺得有什麼壓力，「送別」這個詞兒我覺得也挺好的，也很人性，也真正是我們家屬的想法，送別我們的父親。

記者：可是沒有公正的評價？大家都認為趙紫陽先生是前國家領導人，應該寫上頭銜、職務，應該以國家領導人的規格舉行一個公開的隆重的追悼會。

王志華：這個我想說的是，因為整個這個遺體告別儀式不是家庭搞的，是組織上辦的，所以這個問題不是我們決定的。

記者：那你們是迫於壓力接受的嗎？

王志華：我想我們主要是考慮對父親的感情，我們希望他平平安安地很好地走，所以我們也就同意這種儀式，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迫於壓力。另外，我覺得這個和政治方面的一些事是兩回事兒，但我們肯定有我們的意見。

記者：聽說前段時間兩方一直在協商，因而拖延下來，海外的各界人士都在呼籲給趙紫陽先生開一個隆重的追悼會，給趙紫陽先生一個公正的評價。我們想家屬也在一直這樣爭取，所以後來聽到最終的消息，大家就覺得家屬是被迫的，沒有辦法才答應

的。

王志華：因為首先我想，這個事情，國外和國內的情況可能有些不同，你們可以自己憑著自己的意願舉行各種活動，但現在在我們這裏可能還不是太完全可能，這是一個。再一個，在整個喪事的過程當中，我們主要考慮的是我們對父親的感情，沒有考慮太多其他的東西。至於其他方面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非常明確的，而且我們一直在堅持我們的意見。

記者：消息上說，新華社事後會發一個生平、評價，是嗎？

王志華：這個我們不知道。我想再說一遍，因為整個這個是組織上辦的，至於最後會發什麼東西，是哪個單位發，是什麼內容，我們都不是太清楚。

記者：那萬一他又要提什麼「六四」中「犯嚴重錯誤」這一點呢？

王志華：那是他們的事兒。

記者：你們不想爭取一下嗎？

王志華：我想說的是，我們自己的意見我們表達了，而且我們一直堅持，我們已經正式表示過我們的意見，因為很多事情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記者：國內很多朋友都在堅持，甚至因為這件事情被抓，國外的呼聲非常地大，全球都在搞悼念呼籲的活動。也許大家繼續努力一下，會有一個好的結果，大家都希望給趙紫陽先生一個好的評價，一個好的蓋棺論定，這樣大家都心安。

王志華：我想，對我們的父親來說，他做為一個政治人物，做為一個歷史人物，他的結論實際上應該是歷史做的，是人民

做的，是老百姓做的，這結論我覺得其實早有了，就是你能不能正視他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從沒有動搖過，我們特別有信心，而且我們並不是覺得這個結論是需要其他的什麼人做。我記得，有這麼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們真的特別相信這句話，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應該超然一點。

記者：您覺得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社會的關注是否起作用呢？

王志華：當然我們都特別感謝所有關心這件事情的人。而且我們應該說這種關心是一直的、持續的，我相信將來還會有很多人很關心他，所以我們真的特別感謝，我相信這些事情都會有作用，應該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記者：那你們家屬下一步還會有什麼態度嗎？

王志華：我們的態度一直是很明確的，我們並不會因為某一件事或者因為某一個什麼，去改變我們的立場，我們最基本的立場是很明確的。

記者：據說告別儀式一般的人不能參加，我北京的一個朋友說他曾經去過你們家弔唁，但是治喪委員會發布的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名單上沒有他的名字。

王志華：這個我就不是特別清楚了，那肯定就是組織者的決定。

記者：大家很能理解你們的處境，既為失去親人悲痛又遭受中共方面的壓力，但是希望你们知道海外的人都和你們站在一起，各個團體共襄義舉，一直在堅持呼籲。

王志華：我們當然非常感謝所有對這個事很關心的人，我

們真的很感謝，我們也很難用語言來表達，而且我們知道，一直以來大家都很關心這個事兒，這也是對我們的一種鼓勵、一種鼓舞，我們會堅持我們的想法就是了。

記者：遺體告別儀式上會說什麼嗎？比如生平、簡歷、評價之類的。

王志華：這個具體問題都是他們組織的單位在搞的。有這麼一個儀式，但是不叫追悼會。

記者：最後會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嗎？

王志華：可能不會。

記者：趙紫陽先生也是前國家領導人，為什麼不葬在八寶山前國家領導人員所葬之地？

王志華：我們家屬有我們自己的想法。

記者：胡錦濤、溫家寶等現任領導人會去參加嗎？

王志華：這個不知道，不到那一天，我們都不知道。

記者：名單都是他們控制的嗎？

王志華：名單呢，一部分是他們來通知的，一部分是家裏提供的，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情況。至於誰能去，誰不能去，這個我們就不太清楚了。

記者：那鮑彤先生呢？他能去嗎？

王志華：這個我們不清楚，他會不會得到批准，我們不清楚。當然我們家裏是希望他能去，而且我們這個態度也是明確的，但能不能去，這個決定不在我們。

（大紀元一月二十八日訊）



## 陳一諮：中共當局引天怒人怨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陳一諮先生曾經擔任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是趙紫陽主政時期的智囊人物。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以武力鎮壓了北京的民主示威，趙紫陽下台，而陳一諮受到了通緝。他是因「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級別最高的中共官員之一，目前在紐約負責「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工作。陳一諮現任大紐約各界公祭趙紫陽先生籌委會主任。

### 比最壞的情況還壞

陳一諮：比最壞的情況還壞。對趙紫陽的處理更說明了共產黨頑固堅持自己的錯誤。以下為陳一諮先生訪談錄：

我看了新華社的稿子之後，心裏覺得很悲哀，覺得共產黨喪失了自己最後的良知。原因：為什麼大家當時對胡溫新政還抱有某種希望和幻想，因為江李太不得人心，而胡溫新上台的時候又表現了一點親民的傾向，大家都以為胡溫能逐漸糾正江李時期縱容權貴、蔑視平民，使得弱勢團體利益受到傷害的局面。但是從這次對趙紫陽病故一直到遺體告別，所反映出來他們的這種心理和行為，可以說在國際社會裡，胡錦濤的名聲會降到冰點。那麼在國內，當年跟趙紫陽共事的人或者是在趙紫陽主持改革期間得到各種利益的各個階層的人，也會對胡溫大大地失望。為什麼這樣呢？第一，他們在新華社發的稿子裏面，講到改革開放早期，不敢提他當時擔任過兩屆總理和兩年總書記，是當時主持改革的主要領導人。「有益的貢獻」，一般的老百姓死了，也可以說是

在改革開放中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而且說「改革開放的早期」，其實，一九八九年以後有什麼實質性的改革？如果不是趙紫陽當時在農村改革、經濟改革、對外開放方面奠定的基礎，中國有今天的繁榮嗎？中國老百姓的生活能有所改善嗎？至於思想上、政治上，那根本就是全面倒退，所以有人說，現在比文化革命中對民眾的控制還要嚴重。我們再看，最後講一九八九年中犯了嚴重錯誤，趙紫陽反對把槍口對準民眾，這是何等的人性和人道精神的體現！放在任何時期，老百姓都會尊重這樣的人。

他提出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最後拒不承認自己犯錯，他堅持了這樣一種理念，只會讓老百姓更記住他，歷史上留下他的清名。共產黨連一點點檢討、一點點承認自己錯誤的意思都沒有。我覺得他們在國際社會丟盡了臉，在民意上也使得他們大大地喪失了人心。當然，共產黨內有健康的、民主的、希望改革的力量，就像九十歲的萬里罵胡錦濤「混蛋」，我覺得罵得一點都不冤，他確實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我們要認清胡錦濤的真面目，所有有良知的人要認清他的真面目，不要對他再抱什麼希望，他是教條的專制主義者。

### 共產黨「沒治了」

胡錦濤不可能領導中國走向民主。就像我昨天經過核實趙紫陽在去年夏天跟他一個朋友的談話中說的：「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主義建設的黨，它控制了全國的所有資源。……共產黨就必然會腐敗，有權勢的人必然會利用他們對資源的控制權把社會財

富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中國現在搞的是最壞的資本主義！西方早期資本主義也壞，但可以逐漸走向進步，走向文明，而中國這個最壞的資本主義不可能走向進步！」如果堅持這樣的一種方向的話，仍然用專政對付民眾，維護少數特權主義者的利益，不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那中國確實是前途黯淡。

所以為什麼趙紫陽說共產黨「沒治了」，就是指現在的領導人沒有理念，不知道會把中國帶向何方。而所有走向現代化的國家無不是走向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途，沒有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那麼中國是沒有希望的。而市場經濟如果沒有民主政治做為保障，一個黨壟斷所有資源，只能走向腐敗，走向趙紫陽說的「最壞的資本主義」。

當然，當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侵害，更多的人覺醒的時候，那共產黨想改變都來不及了。就像趙紫陽說的，慈禧太后後來搞革命就來不及了，辛亥革命已經發生了。

### 反映出中國政府無能

對趙紫陽後事處理這件事情反映出中國政府無能。面對這樣一個老百姓都希望的、在改革開放中做出巨大貢獻的人，居然沒有一點表示，居然還在新華社發的新聞稿裏，往他身上潑污水、誣衊他。我覺得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看著這個東西，首先是氣憤，氣憤中國政府居然沒有一種健康的力量改變這樣的局面；同時也是悲哀，悲哀我們中華民族怎麼被這樣一批窩囊廢統治著。同時也讓國際社會看到了，他們對一個在共產黨裏擔任過

十年最高領導人的人，因為不同意見，被無理地不經法律審判又沒有判罪的人，軟禁了十五年後，還不能給他應有的、合理的，甚至是比較公正的評價。

不僅如此，我們也看到，大陸所有的報紙一律被他們控制著不許發表意見，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沒有任何的新聞自由，不僅沒有新聞自由，連老百姓去悼念一個他們尊敬的領導人的自由都沒有。

很多人被警察毆打，外國記者被他們驅散，這叫什麼國家？這跟希特勒的法西斯國家有什麼區別？

通過這次事情，是大家認清中共、特別是胡錦濤的一個最佳的機會，可以使全體中國人都更加覺醒，這樣的領導人不可能把中國帶向進步之途，走上民主之路。

我看了遺體告別的報導和新華社發的新聞稿之後，我是感慨萬千哪！在全世界民主化都成為潮流的時候，中共現任領導人還是這麼墨守成規、堅持幾十年前已經被實踐證明的不成功的意識形態和做法，我是非常感慨的。

### 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悲慘的局面

一時勝負在於力，原因在於他們掌握著全部的國家機器。很多人仍然被他們蒙蔽，為什麼三十歲以下的人不知道趙紫陽，甚至不知道「八九」，不知道「六四」？這就是共產黨用他們錯誤的輿論導向使得中國人失去記憶。為什麼不去討論文革、反右？共產黨幹的那些壞事，它都要把它掩蓋下來，用以欺騙民眾。但是它越這樣做，他們將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罪人。

毛澤東已經使得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文革中兩億人被批判，已經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而江澤民上台以後，為了一小撮人，幹了一系列天怒人怨的事情，把很多法輪功學員整得死去活來，把很多有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整得家破人亡，使得相當一部分農民不僅生活沒有改善，而且越來越困難，使得無數工人下崗，最後形成的局面就是官員的普遍腐敗，嚴重的貧富懸殊，而且造成了整個社會沒有廉恥、不講道德，物慾橫流，可以說中華民族歷史上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一種民族陷入悲慘境地的局面。

### 中共當局喪盡人心

表面上看起來經濟在發展，很多人還在為他們歌功頌德，實際上中國已經到了一個很危急的局面。今天，胡錦濤上台以後，居然顯得比江澤民更加教條，更加沒有人性，更加叫中國人感到失望。我想，他們這種做法，是共產極權的迴光返照，而且胡錦濤這樣做下去的話，他將喪盡人心，最後絕不會有好結果的。

我覺得我的心都在流血。中華民族怎麼這麼慘哪！為了我們中華民族的苦難的同胞兄弟，為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未來，我們大家應該團結合作，共同地改變中國，使得中國盡快地走上匯入世界主流的民主之途。趙紫陽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很值得研究。他先搞總統制，以總統的身分搞改革，不是以共產黨領導人身分，就和共產黨有區別了。蘇聯先搞政治體制改革，儘管現在問題很多，但是以後會有很大的發展，俄羅斯是有希望的。很明顯的是，儘管有困難，誰也不願意回到過去，回也回不去了。」

中國仍然是在邪流上越滑越遠。還學古巴、還學北朝鮮，北

## 他終於自由了

---

朝鮮的人飯都吃不飽，老百姓也是在非常的困境中掙扎。我們中國如果學北朝鮮、學古巴，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公道自在人心，歷史會有公論。上帝不會饒恕他們，佛祖不會饒恕他們，老百姓也不會饒恕他們的。

（大紀元一月三十日訊）

## 蘇紹智：中共充分暴露了本質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今年八十二歲的蘇紹智先生曾是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領域中的領航學者，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等職務。一九八七年中共反自由化運動時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八九年四月，江澤民下令封殺《世界經濟導報》，嚴家祺、蘇紹智、包遵信等著名學者聯名發出致上海市委公開信，提出強烈抗議。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後至今流亡海外，現居美國新澤西州。

記者：趙紫陽先生逝世了，您可能已經知道，您有何感想？您對趙紫陽先生如何評價？

蘇紹智：我已經從網上得知這一消息。我對趙紫陽先生被軟禁近十六年至死，十分悲痛。這實際上是中共毫無法律根據地、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地對趙紫陽執行了無期徒刑。這說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幾代所謂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領導層，在破壞法制、踐踏人權、不擇手段地迫害與之有不同政見的黨內領袖方面，與毛澤東之必置劉少奇於死地，沒有兩樣。特別是趙紫陽因不贊成屠殺手無寸鐵的廣大青年學子而獲罪，則鄧江胡輩之殘酷凶狠，似較毛猶有過之了。因此，趙紫陽逝世，不僅僅是一代偉人含冤而逝，而且還是中共領導層的良知之死、人性之死和民主改革思維之死，這實在不能不令人萬分悲哀了。

我認為趙紫陽先生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四大貢獻。

第一是趙紫陽對經濟改革的貢獻。趙在四川省委書記任上

打破了人民公社的桎梏，推行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這使農民真正地獲了解放——生產積極性得以充分發揮出來。由於生產力的大解放，經濟改革首先在農業領域大見成效。這實際上是給整個經濟改革奠定了基礎。對照昔年鄧子恢與曾希聖因試行包產到戶而被毛澤東整肅得死去活來的歷史，趙紫陽之敢於堅定地推行包產到戶，打破人民公社體制對農民和農業的束縛，該需要多麼大的智慧和勇氣，以及多麼深厚的把農民的生死饑飽放在胸中的仁心，以致「要吃糧，找紫陽」成為永遠的史詩！

此後，趙紫陽又指明城市經濟改革的方向，排除重重阻力實現並推廣以市場經濟體制為目的的全面經濟改革。直到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仍然依照趙的方略而進行。今天中國的經濟能夠取得引人注目的發展，不能不歸功於趙紫陽。

第二，與此同時，趙紫陽的突出貢獻更在於在中共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中國政治改革的方案。他是在中共黨代表大會上公開地、系統地展示中國民主化政治改革藍圖的第一人。

趙紫陽在這方面的貢獻，由於後來中共領導層內及政治老人中的保守勢力發動旨在向十年改革反攻倒算的「六四」軍事政變得逞，以致十六年來一直被中共官方有意地迴避、湮沒，甚至誣功為罪，弄得所知者不多，或者知之也不深了。所以現在我們應該特別予以表彰出之，並應廣為宣揚。

第三，趙紫陽站在人民的良知良識的立場上，堅決反對中共內部頑固保守勢力對八九民運的軍事鎮壓陰謀，提出並堅持應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為此，他置個人的權位、利益



和安危於不顧。他的主張雖因「六四」反動軍事政變得遲而未能實行，但他這一大仁、大智、大勇之舉已永遠地深入人心，彪炳史冊。實際上，趙紫陽是被中共的鬥爭哲學搞得殘酷、極端、只知對立、不知妥協的中國社會，開拓了一條應如何理性地、和平地、非暴力地解決社會矛盾的正確出路。「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在民主社會制度下是常識，但在中共極權統治下卻是趙紫陽的創造性貢獻。今後，中國的各地各級當局若能遵此而行，將造福百姓，解放自己，受惠無窮。

第四，「六四」反動軍事政變之後，趙紫陽被誣陷，被罷黜。但在雷霆萬鈞的專制獨裁高壓之下，他不低頭，不違心，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侃侃自辯，義正辭嚴。這在中共歷屆領導層殘酷鬥爭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第一人。而且，終其十六年的軟禁餘生，趙紫陽寧願忍受實際上的無期徒刑也不改初衷，絕不後悔，絕不檢討，絕不向保守勢力討饒。為了中國的民主化，他在道德上、氣節上為中國人民樹立了難能可貴的榜樣。這在被中共搞得利益至上、鼓勵說謊、不顧人格、道德淪喪的當今中國，實在是樹立起了一座做人標準的豐碑。這座豐碑教導人們應如何出污泥而不染；應如何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應如何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座豐碑是可以在道德上挽狂瀾於既倒的。中國人民應該衷心感謝並千萬珍惜趙紫陽用生命做出的這一貢獻。

記者：您認為中共可能給趙紫陽先生恢復名譽並給「六四」慘案平反嗎？胡錦濤政權沒有「六四」血債，何必再背黑鍋呢？您對中共當局從趙紫陽逝去到舉行葬儀期間的種種措施有什麼感受？這裏面說明了什麼問題？

蘇紹智：我早就認為中共現在的胡錦濤政權不會還趙紫陽以公道，也不會為「六四」慘案平反。胡錦濤雖然不直接背負「六四」屠殺的血債，但是他已屬於因「六四」而獲益的利益集團。胡錦濤與三、四十年代在民族危機中和國民黨專制統治下自覺奮起參加革命的那一代共產黨員不同，他是在中共執政後的鋪天蓋地的黨文化的浸淫中長大的。他沒有前輩共產黨員的為了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理想與抱負，他只有與一黨專政同生死共存亡的利益。他不可能為順應民意民心和現代世界潮流而開拓中國民主化的新政，他必然會誓死捍衛中共的一黨專政。在趙紫陽逝世這樁大事中，我本來以為，胡錦濤政權或許能不談功過地舉行喪儀，做個令家屬與官方都算還過得去的結局。誰知連這樣「和稀泥」的方式都做不到，居然最終使出流氓式的欺騙手段來表現其旗幟鮮明地保衛一黨專政利益的態度。

從趙紫陽逝世到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的十三天中，中共當局和各地各級專政機構的所作所為，諸如不許媒體報導，不許人民弔唁，對異議人士軟禁、扣押、以至綁架，對上訪冤民等弱勢群體極盡驅逐、毆打、抓捕之能事，欺壓趙氏家屬，而強行操辦喪事，最終竟臨時推翻與家屬談妥的「不講功過」的協議，在葬儀進行之際令新華社發布消息，稱趙於八九政治風波中犯有嚴重錯誤。凡此種種，全世界均已耳熟能詳，不需贅述。

中共當局竟能如此殘酷毒辣地對待該黨原先的總書記，竟至使出流氓手段，寧可將中國尊重逝者的傳統文化踐踏殆盡，也要對趙紫陽的誣陷不實之辭重新宣揚，以示捍衛一黨之私的決心毫不動搖。對此，我悲痛不平，憤懣之極。

我認為，上述中共的一系列舉措，充分暴露了中共的本質，讓人民對中共的本質認識得更清楚、更深刻了。中共的本質是什麼？那就是：共產黨只重視一黨專政的權力和利益，具體地說，就是千方百計要維護住共產黨對中國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十三億人民的統治。中共領導層心中只有黨的利益，根本沒有人民的利益。歷史早已證明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目前的現實也越來越證明胡錦濤聲稱的尊重憲法、以民為本、民主執政，都是謊言。什麼「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統統都被中共領導層自己的實際行動粉碎了！人民所親見親歷的，只是共產黨及其領導層為了維護一黨專政的統治，可以不顧法律，不顧道德，採取一切殘暴手段，傷害人民的感情，欺騙人民的信任，剝奪人民的權利，侵犯人民的自由，威脅人民的安全……人民所剩的，只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記者：通過趙紫陽逝世事件，您對中共政權今後的走向，怎麼看待？中國民主化的出路又何在？

蘇紹智：中共領導層實際上是明白「六四」鎮壓和非法罷黜並軟禁趙紫陽是違反正義、不得人心的。否則為什麼李鵬、江澤民輩都不出來領「六四」平暴之功，反而都忙著或倒填日月偽造日記，或拜託洋人為之立傳，以撇清責任呢？所以，十六年來，中共領導層對「六四」屠殺其實一直是心虛的、恐慌的。如今適逢趙紫陽逝世，當然更加恐懼，如臨大敵了。但是，一個只認得自己的統治之權和統治之利的政黨，一個或者一堆寧願辜負天下蒼生也唯一黨之私利是從的領導人，是絕對不會主動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中共這次在趙紫陽逝世和葬儀期間的倒行逆施，更欠了人民一筆帳，使得共產黨和人民的矛盾更加激化了。中共對人民的統治，本來就靠謊言和恐怖這兩條。現在謊言已經起不了作用了，還有誰會去相信江澤民「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保先運動」之類的說教呢？國內民眾對這類東西只賦予一片嘻笑怒罵之聲了，因此，共產黨現在只有乞靈於恐怖高壓手段來維持其統治了。

看來，胡錦濤政權確實已經將其令全世界愕然驚詫的宣言付諸實踐——向金正日統治的朝鮮學習如何「管理意識形態」了。目前中共對意識形態的管理確實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厲的。趙紫陽逝世，中國的媒體被悉數封殺，無一字「擦邊球」，便是明證。據傳中共最近甚至還說要黨管企業，那豈非要推倒最根本的經濟改革了嗎？

這樣搞下去，不但說明中共的走向是要向毛澤東路線回歸，簡直有可能走向法西斯之路了。

中共倘若走向法西斯，當然其最終的結局必然會如來自共產黨營壘權力中心的吉拉斯在《新階級》一書中所揭示的：那些共產黨權貴在爭奪權位的互相殘殺中成為共產主義的掘墓人而使「共產主義自己推翻自己」。但是，在此過程中，廣大人民必然首當其衝地大吃苦頭。為了不使人民遭難，當然應該竭盡全力地不允許中共走向法西斯。

這裏，關鍵在人民。喚起人民奮力保衛人權、正義、公理，反抗專制政權，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實乃當前最主要的任務。這必然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但是這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大紀元二月十二日訊）

## 吳國光：趙紫陽後事與中共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吳國光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是趙紫陽主政時期政治改革智囊團成員之一。「六四」事件之後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在香港任教九年，目前是加拿大維克多利亞大學中國和亞太中心主席和教授，並執教政治科學系和歷史系。

記者：吳先生，您好。趙紫陽先生去世十幾天以來發生了很多事情，海內外呼籲給趙紫陽先生開追悼會、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中共方面控制媒體的報導、壓制民眾對趙紫陽先生的悼念活動，最後通過新華社發表了對趙紫陽先生的生平評價中特別指出趙在一九八九年「犯了嚴重錯誤」。您對整個這件事情怎麼看？

吳國光：北京用了一種欺騙的手法，也有高壓的手法，按照他們的意志來辦趙紫陽的喪事。所謂欺騙的手法就是他原來告訴趙紫陽的家人說不會再散發趙紫陽的生平，也就是迴避對趙的評價這個問題，因為在這一點上北京當局和趙的家人有爭議。那麼他們原來就講避開這一點，但是最後他們還是發了一個新聞稿，在裏面強調趙紫陽所謂的「嚴重錯誤」，那麼這個顯然是欺騙的手法。所謂高壓的手法，就是他們再此之前威脅趙家的人說怎麼辦追悼會、怎麼遺體告別儀式，都是國家機密，不能說。

而且採取惡劣的手段阻止民眾到趙家去弔唁，用種種的方式逼迫趙紫陽的家人不得不同意，或者說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要辦這個遺體告別儀式。這個遺體告別儀式當然也說明北京當

局面臨強大的國際、國內的輿論壓力的情況下，還是做了一點讓步。因為按照他們自己想的辦法就是說什麼都不要辦，完全就用那五十幾個字的逝世的消息，就把這個事情過去了。這是他們原來最願意的辦法。就是最低限度地報導這件事情，最高限度地抹殺趙紫陽這個人，這是北京當局的最初的想法。

但是由於這種做法非常沒有人性，受到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所以他們就裝模作樣地辦了這個遺體告別儀式，但是在整個這個過程中，如臨大敵。據新聞報導說，有上萬警察在那裏，而且用各種各樣小人的手法、卑鄙的手法。比如說，趙紫陽的遺體那麼早凌晨從北京醫院往八寶山運的時候，車上面還不能放照片，一般的老百姓願意放照片都是可以的。據說在靈堂裏，擺的所有花圈都不允許寫任何的詞，只能寫上送花圈的人名或者單位的名字，不能表達任何的用中國人傳統的方式、輓聯等，來表達送花圈的人的感情。

這些都不是光明正大的手法。就是一些非常卑鄙的手法，來盡力地抹殺人民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趙的哀悼之情。

記者：您覺得中共這樣的處理方式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會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嗎？

吳國光：紙包不住火，願意瞭解情況的人慢慢地就會通過海外媒體或者其他渠道，得知這種情況。一般稍有良知的人對於北京當局的這種處理手法都是非常憤怒。這種憤怒和民眾這麼多年對中國官方各種政策的強烈的不滿，匯集到一起，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什麼時候爆發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可以講，蓄之既久，發之愈烈，也就是說，積壓的時間越長，爆發的

時候就會越強烈。所以在這個事情上，中共的領導層再次欠了中國人一筆帳，這個帳是早晚都要算的。

記者：近來社會矛盾突顯，民間反彈很大，很多人說「對中共已放棄幻想」，這次又加上趙紫陽先生這件事情，民心更加喪失殆盡，您認為中共還有前途嗎？

吳國光：其實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就基本上喪失了原來曾經有過的這樣一些威信，文化大革命就已經使得中國共產黨的那套東西破產了。但是文革以後，由於新的健康力量的抬頭，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使得人們一度又對中國通過和平演變這樣一種穩健的轉型來改變中共的體制抱有相當的期望。這個期望在一九八九年已經被粉碎了，包括趙紫陽這樣一個前中共中央的總書記，他都是希望推動中共的和平轉型，最後打破中共這樣的一種體制，建立一個新興的政治制度，這是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以前所努力的。

記者：人們想避開政治，但是每個人都在這個陰影下，民眾爭取一個基本的生存權，就要說你搞政治，說點、寫點真心話，就要定個罪名，什麼「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類的。誰都逃不出中共所謂的「政治」這個東西。

吳國光：所以這個政治最後就是把人性的一些基本的、正常的東西全都扭曲、剝奪。今天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什麼都是假的，已經發展到這麼一個地步，這就是和政治制度密切地相關在一起，你不能說真話，你不能做真誠的人，你不能辦真正的事，這個社會已經喪失基本的信用，所以這樣一個專制政治對於人們心靈的茶毒的嚴重性就在這裏。在中國，不是說你做了官，進

了官場，才要說假話，你做個老百姓，你也不能不說假話。比如說，我看到外國記者去問中國的老百姓，說「趙紫陽去世，你們怎麼看？」有一些老百姓能夠本著良心說話，但是這樣的人一般都很害怕，說「你不要寫我的名字」，而大多數人是鸚鵡學舌地把官方的那一套說幾句，誰都知道那是假話。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霸道的體制，這種體制不單單是在政治的範圍內。什麼叫政治，按照孫中山先生的定義，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就是大家的事情。人人都不關心大家的事情，每個人只關心自己鼻子尖下那點既得利益，那實際上你的利益正在被損害。

記者：有人說，老百姓中有的不知道事實真相，有的知道了也麻木冷漠，這兩方面都是共產黨造的孽，一方面通過控制媒體輿論欺騙民眾，另一方面，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抹殺人性，使人道德敗壞，明哲保身，對別人的事情表現得很冷漠，只想個人的眼前利益。

吳國光：這種對中華民族幾千年來遺留下來的道德資源的損害，是造子孫萬代之孽。一個民族的道德資源是長期、世世代代積累下來的，現在在短短的中共統治的幾十年中，已經把它糟踐得幾乎蕩然無存。這個不是金錢能夠代替的，也不是那些高速公路、高樓大廈能夠代替的。道德是維繫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的，在這麼一個道德資源完全淪喪的情況下，可以想像到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境地。這種情況下，今後要進行道德重建，不是短短的幾年、幾十年就能達到良好的效果的，中國的老百姓被他們搞得這麼冷漠、這麼自私、這麼麻木，對中國將來的



發展絕對是一個負資源。

中共現在在那裏壟斷資源，未來有一天它不能再壟斷下去，中國要發生政治轉變，那麼這種自私冷漠麻木的民眾都是未來健康政治的大敵，都會成為將來健康政治的最大的阻力。

在趙紫陽的這個問題上，中共繼續顛倒黑白、繼續混淆是非，繼續抹殺中國人起碼的道德良知，這就是在進一步造孽。

記者：有人說，中共混淆視聽的另一方面，也是他們用以壓制民眾中正義力量的慣用手法，就是煽動極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普通的民眾提點意見，就成了不愛國了。外國政府說他的人權惡化，他就說別人干涉別國內政。您怎麼看這些問題？

吳國光：其實中共是最沒有資格講愛國主義的。為什麼呢？他的老祖宗都是從外國請來的。共產主義運動本身就是不講民族傳統的一種運動，馬克思的名言就是「工人沒有祖國」。所有的共產主義運動，它的英文就是「International」（國際的），它是不講國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原來跟隨馬克思的一些人，他們支援德國的政權和其他一些國家進行戰爭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們罵了個狗血噴頭，說「你們怎麼能做個民族主義者？做個德國的愛國主義者呢？做為共產主義者，你們就是要反對德國政權本身的。」其實共產黨是最不講什麼愛國主義的。

那為什麼今天共產黨總拿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來說事兒呢？來鼓吹這個東西呢？就是因為它那套共產主義的東西在中國已經破產了，沒有人說這個東西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

這個共產主義的東西破產後，它又拿起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這套東西，用這個東西來迷惑中國的老百姓，利用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情結，以維繫它的合法性。它講的愛國主義是一種非常無聊的愛國主義，可以這樣講。中國一般的老百姓，比如現在的青年學生，民族主義情結很強，反美、反台灣這個情結很強，其實這個說起來很可笑。共產黨是為了它的一黨私利在那裏講虛假的愛國主義，有的老百姓為了發洩情緒也跟著在那裏講虛假的愛國主義。

什麼是愛國主義？就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能夠犧牲個人的利益，這才是至高無上的愛國主義。中共能為了中國的利益犧牲它共產黨本身的利益嗎？它顯然不會，而且恰恰相反，他們是把國家的利益放在他這個黨的利益之下的。它用黨的利益來綁架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用黨的利益來替代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那麼什麼是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呢？這要由這個國家的公民通過一種渠道來決定。

中共沒有一種機制讓中國的老百姓來決定什麼對中國是好的，它自己在那兒說一通，然後強加給民眾。民眾沒有權力知道資訊，做出自己的判斷，做出自己的選擇，也沒有權力把這個選擇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來，那你這是愛什麼國呢？愛的是一種虛幻、空洞的東西。

美國也講愛國主義，我們看到，當美國和伊拉克進行戰爭時，美國人民照樣可以在美國的街頭反對美國政府向伊拉克開戰，這要是在中國，這還得了了？如果中國和別的國家打仗，你要到街頭反對中國政府的政策，那就一定被看做是漢奸了嘛。不僅當局要把你治罪，那老百姓還不得把你罵個狗血噴頭，這簡直

就是漢奸，無論怎麼樣，我們國家在和別的國家打仗呢，你怎麼能罵我們國家呢？但是在美國，反對戰爭的人也被認為是愛美國的，只是這部分人認為我反對美國和別的國家打仗，這才是為了美國好，他有這個權力，因為他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他有權力表達怎麼樣他認為是為這個國家好，他對國家利益是什麼有定義的權力。在中國，中國的公民沒有定義什麼是國家利益的權力，那有什麼國家利益需要我們去給他犧牲的呢？那這國家利益不過是強加給我們的。

所以我認為，在老百姓沒有起碼的知情權、起碼的表達權、起碼的政治參與權的國度，講愛國主義是沒有價值的。

記者：很多人也提到，另一個被中國共產黨所混淆的概念就是中共和中國，灌輸「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等輿論宣傳。所以有些老百姓也知道共產黨不好，但也無奈地說，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呢？很多人也提到中國共產黨通過歪曲歷史來欺騙民眾。您是研究歷史的，能請您從這個角度談一談嗎？

吳國光：五十年代的那套宣傳，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那我們就看看，你這個所謂的「新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新中國呢？我不是一個進化論者，我不信新的東西就一定是好的。新中國不見得是個好的中國，新中國可以比舊的中國更差、更壞。世界上很多新東西都比舊東西更差、更壞。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常識。共產黨當年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利用了中國人的「什麼東西都是新的好」這種想法偷換概念，好像是有了共產黨一切就都好了。

後來就講得更玄了，好像是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沒有辦法了。沒有共產黨，那中國以前兩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是不是完全都是黑暗一片呢？如果都是黑暗一片的話，什麼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等於中共否定一九四九年以前所有的中國歷史，共產黨否定中國五千多年的傳統文化，他還有什麼資格講愛國主義啊？！古代五千年文明非常輝煌，比今天共產黨控制的中國輝煌多了，沒有共產黨的時候，中國的情況更好，在世界上遙遙領先。

說什麼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中國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負。其實現在也有研究外交史的學者發現了一點，在四十年代的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世界有四大強國，美國、當時的蘇聯、英國和中國，當時的中國後來被中國共產黨描述為民不聊生啊、積貧積弱啊那麼一種情況，但是中國在那個時候是聯合國的創立國之一，中國是在那個時候成為聯合國外交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並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後來建立的「新中國」，中國才有今天世界上的這個地位的。那是在一九四九年代在蔣介石領導下正要和中國共產黨打內戰前夜的中國，在世界上獲得的外交地位，這個外交地位是非常高的。這一點就可看得出來，中國那個時候不是像共產黨後來所歪曲的歷史，說中國在世界上這麼糟糕。

如果研究經濟史的也可發現，中國在三十年代的經濟增長是相當得好。那個時候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好得多。問題就在於，中國共產黨一個慣用的手法就是歪曲歷史，歪曲歷史以後，大家就不知道真實情況，就以

為那個時候中國真是糟糕得不行。那個時候中國確實有很多糟糕的方面、很多弊病的方面，但是今天的中國的糟糕的程度比起以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說，四十年代中期中國的官員相當腐敗，但是今天的腐敗比那個時候嚴重得多；那個時候確實有貧富兩極分化，但是今天的貧富懸殊比那時要嚴重得多。

所以說，如果中國歷史上有壞的東西，那麼在中共的統治下，這些弊病也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嚴重。中國歷史上那些優良的東西呢，今天中國全都沒有了，所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罪人，它根本沒有資格講「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它是完全沒有資格這樣講的。

記者：剛才您談到了中共對中華傳統文化和道德的破壞，其他的方面也一樣存在這樣的情況，比如：自然環境、生態環境等等。不知您有興趣就這方面說說嗎？

吳國光：我現在住在加拿大，經常有海鷗會飛到我的陽台上來。我看到後，就想起，根據我的記憶，杜甫的詩裏有寫到說鷗鷺會飛到他的家裏來，飛到杜甫草堂來。那是一千多年前中國。但現在呢，在中國哪裏可以見到呢？

所以說，中共對自然資源的破壞也是造子孫萬代之孽。這也不是短時間能恢復的，而且已經開始構成對全球的威脅。中國污染造成的酸雨在幾年以前已經造成了美國西海岸華盛頓州的蘋果受到損害。這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禍害了。如果有一個健康的政治制度，那麼老百姓深受其害以後就會要求政府調整它的政策，就會迫使政府尋求一個比較健康的發展道路。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不給老百姓其他的好處，不准你說話，

什麼自由都沒有，唯一地就說：好吧，你看我讓你經濟增長。那麼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它的合法性就完全依賴這一點。所以它就不惜任何代價地追求經濟增長，這樣就使得中國的生態環境、道德體系等等各種各樣的東西都被破壞掉，這個破壞就使得僅有的財富的增長是無比的代價。

就拿能源這個東西來講，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帶來了中國的能源危機，有的人可能會說，那經濟增長一定需要多消耗能源的嘛，那和中國政治制度有什麼關係？我要講，能源專家已經發現，中國能源的利用率是日本能源利用率的大約十六、七到二十分之一，是美國能源利用率的大約六到十分之一，也就是說，美國用這點能源可以造六件東西，而中國用同樣多的能源只能造一件東西；日本可以用那點能源造十六件東西，而中國用同樣多的能源只能造一件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呢？和這個政治體制有什麼關係呢？那我想，關係就是：第一，這個政治體制壓制人才，為什麼同樣的人，有的人就能用那麼少的能源做出那麼多的事情呢？是因為有人發明科學技術。中國一天到晚講科學技術進步，為了它的現代化，中國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為世界貢獻過什麼發明、貢獻過什麼創造？貢獻過什麼對人類有益的東西？因為中國的人才都受到壓抑，中國的那些科學家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搞不出來，跑到西方來都做得很好。這當然是政治制度問題。

當然還有能源的利用過程是不是來自民眾的壓力，如果民眾給予這個壓力，他不讓你稱謂這麼高，它不讓你破壞環境為代價。

所以這個政治體制是關係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的很多很多的問題看起來和政治體制很遙遠，實際上都是和政治體制緊密相關的。

這個也是為什麼做為一個有遠見的治國者，趙紫陽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提出來，一定要在中國進行政治制度的變革，而且這個變革重要的是制約專制者的權力，讓民眾有參與的渠道，保護老百姓的權力。所以說這個政治制度扼殺人才、扼殺創造性，使發展的代價尤其的高。

記者：聽消息說，雖然中國表面上經濟是發展了，但是實際上是很不穩定、很脆弱的。一方面貧富懸殊極其嚴重，很多老百姓下崗，有的連飯都吃不上，一部分人富裕了，但是更多的廣大的老百姓們還是生活很艱難。另一方面，經濟依賴外國投資和中國老百姓的存款，裏面都是空架子，據說如果中國人都去銀行提錢，那經濟一下就垮掉了，而且聽說外資撤走的可能性很大。

吳國光：是的。在整個經濟增長的表象下，首先，絕大部分民眾，特別是農村的民眾，他們不能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資料說，在過去的大約十年當中，中國的貧困人口，不僅絕對數、總數在增長，而且比例也在增長。這可以從二〇〇四年夏季中國官方公布的資料中查到。

當時公布以後，國際輿論都非常驚訝。中國官方都不得不承認這個現實，可見這個現實是沒辦法掩蓋的。中國已經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在世界上講正在成為一個經濟大國，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太奇怪了，如果說貧困人口的絕對的數位在增長，那你可以說可能是人口增長了，但是貧困人口的

比例也在增長，這個就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了。

另外，中國經濟的發展嚴重地依賴於外國資金的流入，中國做為一個經濟規模這麼大的國家，就世界經濟的常識而言，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越大，它的對外依賴程度就越低。比如說，像香港這麼小的一個經濟體，當然它對外的依賴程度非常高，完全是靠做買賣的，它自己也沒有資源、也沒有農業等東西。再看美國，它的經濟這麼開放，但是它的對外依賴度很低，因為它自己有很多工業、農業，就不存在對外依賴的問題。日本是一個能源非常短缺的國家，但是它的經濟依賴度大約是百分之三十，但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大約是百分之五十左右，也就是說，在中國，每創造一塊錢的財富，其實有五毛錢是通過外國人來投資、和外國人做生意所得到的。日本它的資源這麼短缺、人口這麼密集，一向認為它是一個依賴國際經濟迴圈的經濟體，然而它的一塊錢的財富中只有三毛錢是通過外國的。也就是說，中國完全是靠外國的輸血來維持經濟的發展。

還有一方面，老百姓的高儲蓄率，這是東方經濟發展的一個特點，中國人喜歡攢錢，這些錢都放到國家銀行裏，國家銀行就拿這個錢投資。我們知道，投資是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你有錢，才能生錢。老百姓的這個錢其實是在被政府借用，而中國老百姓只拿很低的利息。而且為了中國政府的這樣一個利益，中國政府還強行壓低人民幣的國際兌換率，其實人民幣的國際兌換率提高了，對中國的老百姓是一個大大的好處，中國老百姓如果上外國旅遊，那個錢就很值錢了。

還有，中國的金融體制非常脆弱，有各種各樣的數字表明，



中國的金融體系是一個千瘡百孔、一觸即崩潰的這樣一個體系。所以中國老百姓的錢放在那裏是非常危險的。可是不放在那裏，又放在哪裏呢？它沒有自由競爭的銀行，只有官方壟斷的銀行。

所有這一切的因素都說明，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是一個非常不健康的經濟發展，它隨時可能有大風大浪，隨時可能有嚴重的危機，隨時可以崩潰。做為一個政治學家，那麼我的看法是：現在的這一套政治體制，它不足以支撐中國的財富增長。打個比方說，這整個一個爛房子、破房子，它是用一堆爛木頭建起來的。過去上面只鋪了幾根破稻草，可能看上去還很相配，但是現在你要在上面換上金磚金瓦，那整個架構要崩潰的可能性反而就更高了，就支撐不住了。

所以，我覺得就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的關係而言，中國可能就是兩種前景，一種前景就是，也許有一些樂觀的因素，就是在整個政治架構垮台以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到了一定的程度，那麼老百姓在未來的幾年也許能夠得到更多的好處，有更多的人不在貧困線上掙扎，他們有了基本的所謂小康生活，當民眾的生活水平真的有一天達到了那種程度，那我想老百姓自然會要求他講話的權力。

如果一個人不依靠政府，自己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沒有後顧之憂了，自己住自己的房子，也不用單位怎麼樣我，甚至單位把我解雇了，我還能生活一段時間。到了這樣的情況，我很難想像，他還每天就是知道吃喝，政府不准他講話，不准他幹這幹那的，他還會老老實實地，我很難想像奴性到了這種程度的民族。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老百姓會要求他的政治參與

權和他的公民權。

如果是還沒有到那一天，這個經濟就已經要出問題了，那麼我覺得這個經濟危機也會帶來中國政治變革的要求。因為今天中國的老百姓之所以還能容忍這一套荒謬的、殘酷的、沒有人性的、不能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體制，就是因為共產黨一天到晚嚇唬老百姓說，你要是不搞我這一套的話，你就沒有飯吃了，中國經濟就要出問題了。如果實踐的發展證明在它的統治下經濟也要出現問題，那老百姓還有什麼理由接受它這套政治制度。共產黨你原來就是許諾說大家老老實實的，經濟就沒問題，那現在我們都老老實實的，那你的經濟還是要有問題。

我想，中國的經濟無非就是這兩種前景吧。一種就是發展得挺好的，財富積累得越來越多，那就是我剛才講的第一種情況，另外一種就是出現危機，那就是剛才講的第二種情況。這兩種情況都會帶來政治變革。所以政治變革這道關，中共是躲過不去的。

那麼現在的領導人，他們放棄了最後一次機會，也就是趙紫陽去世這件事給他們提供的機會，讓他們緩和和民眾之間的矛盾，釋放一些政治改革上的善意，然後慢慢地啟動政治改革，他們把最後這個機會放棄了，他們再三地向世界和中國民眾表示他們堅決不搞任何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現在也用「政治改革」這個詞，但這個詞完全是一個虛假的詞。政治改革的目的對它來講，是要保持中國共產黨永遠執政。這個不叫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重新分配權力，就你中國共產黨坐在那兒管著一切東西，這哪叫政治改革呀？

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共產黨是拒絕真正的政治改革，這個機會都放棄了，那我想未來中國政治變化的前景可能是動盪的一個前景，可能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在位面臨未來政治改革的時候，至少現在這個領導層，要想得到善終，恐怕不太容易了。

記者：那您覺得中國的出路在哪裏呢？

吳國光：我想中國的出路就是政治變革，就是公民的覺醒，維護自己的權力，建立一種制度，來保障自己的公民權力，我覺得這是中國的出路所在。

當然，不可能都是個體的行動，一定要是集體的行動。集體的行動呢，當然就慢慢地就會產生出一些團體，然後才能形成一定的力量，來改造這個政治制度。這個其實就是趙紫陽先生在一九八九年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所堅持的一個東西。我個人的經歷呢，我是在一九八九年以前好幾年當中都是在趙紫陽先生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政策研究班子裏工作，對那段歷史我是瞭解得比較清楚。

這就是趙紫陽當初給中國指出的一條道路。一九八九年呢，老百姓上街、學生上街，也是要求這樣的一種政治制度的變革。

其實一九八九年的鎮壓表示中國共產黨拒絕走這樣一條政治制度變革的道路。今天他們這樣對待趙紫陽呢，就是再一次表明說，他們還是拒絕這樣一條政治制度變革的道路。所以我覺得再指望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地推進政治制度改革，這個恐怕是非常不可能了。

未來中國的政治制度變革，只能是走公民覺醒、公民抗爭、公民維權這樣的一個道路。

記者：現在實際已經在顯露一些苗頭了。國內的一些維權人士此起彼伏，最近有幾位正義的律師勇敢地站了出來，比如：高智晟啊、郭國汀啊，國外也有各種全球性的活動，比如：國內外的退黨不斷，「告別中共」的活動方興未艾，最近「悼念紫陽，告別中共」的活動也是聲勢浩大，這一系列現象都在逐漸顯露出來民眾的覺醒。

吳國光：是的。從近兩年的發展來看，趨勢確實是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強大。剛才講到中國人沉淪麻木的同時，我們也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公民不僅覺醒，而且行動，我覺得這也是這個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的趨勢。你想，在現在的這麼一個統治下，中國的社會矛盾積累得這麼深刻，這麼嚴重，那中國這個民族兩千多年有文字的歷史，很多這樣古老的文明都滅亡了，但中華文明沒有滅亡。那麼這個民族一定有它內在的生命力，這個生命力可能會在這個方面表現出來，我覺得這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大紀元一月三十一日訊）

## 劉賓雁：中共不會有好下場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遺體告別儀式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新華社簡要報導了趙紫陽的生平，隻字未提趙曾擔任國務院總理、黨總書記、以及他在改革開放中的重大貢獻，卻特別指出趙在一九八九年「犯了嚴重錯誤」。大紀元採訪了中國著名的報告文學家、現居美國的劉賓雁先生。

劉賓雁：有關趙紫陽遺體告別儀式、新華社的報導，這些事情聽起來也不是很意外，因為這個政權或者說這個領導班子，有一系列的跡象證明他們不想往前走，而是打算往後退。八十年代中期，我當時寫的報告文學有的能夠發表，有的不能發表。當時還有幾位很有名的作者，都寫了一些很好的作品。應該說我們所寫的作品在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部分都可以發表，沒有遭到太多的干涉，或者受到打擊。

如果當年寫的那些東西拿到今天的中國——胡錦濤領導下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就是二十年後，能發表嗎？絕對不能發。這不是很滑稽嗎？當時我們是覺得自由不夠，所以拚命地爭取這個自由能夠有所擴大。怎麼改革搞了二十年，回過頭來自由反而更小了，這不是豈有此理嗎？

胡錦濤居然敢這麼做？比如說他所謂要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等問題，還誇讚北朝鮮怎麼怎麼好，金日成怎麼好，古巴怎麼好，罵戈爾巴喬夫是共產黨的叛徒。這些態度都是太明顯了，就

是他並不想再往前多走一步了。比江澤民還要壞，這也是大家的共識。

所以在趙紫陽的問題上，這是連在一起的。他確實只能採取這個態度，假如說趙紫陽沒有錯誤，那你憑什麼關他十六年？假如說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改革中有極其卓越的貢獻，那也是個偉大的人物，為什麼要把他關十六年？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看起來很失望，但是對於胡錦濤來說是合乎邏輯的。他就是在倒退的道路上，比江澤民還要走得更遠。我們都不明白，朋友見面都會談這個問題，他為什麼這麼做？難道他真的認為這套東西在中國行得通嗎？難道他認為這麼做他會有一個好下場嗎？我們在旁邊看得很清楚，無論如何，中國已經不是八十年代的中國，更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 中國非走向動亂不可

胡錦濤還抱著毛澤東的大腿，想把中國拉回到毛澤東時代，那顯然是倒行逆施，中國人不會答應的，就算是現在發了點財的，小日子過得好的中國人暫時不在乎，但是這套政策必然要使中國的經濟改革本身都發生問題。

所以所謂的小康都沒法維持，中國非走向動亂不可，而胡錦濤也絕對不會有好下場。我相信，共產黨裏面真正同意他這種做法的人也不多。所以我覺得，這次對於趙紫陽這件事，胡錦濤的表現應該是意料中的，是合乎邏輯的，對他來說。

看來就是要走這麼一段路，叫中國人增加點痛苦。但我不相信共產黨中的多數人、中國人中的多數人，會接受他，我認為他

的下場會很糟糕的。

### 經濟不穩定外資隨時可能撤走

歐洲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沒有出現過這樣明顯的倒退的情況，公然地主張向毛澤東時代倒退，沒出現過。他倚仗的有恃無恐的無非就是看起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比較快，在世界上好像是財大氣粗，其他國家好像是對中國另眼看待了，等等，他以為靠這一條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其實，這個是不鞏固的，這個經濟本身現在看來也並不很穩定，國內形勢稍微有個風吹草動，外國資本馬上會撤走。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麼造成的，外資一撤走，馬上就通貨膨脹、貨幣就貶值了，等等，一系列問題就來了。中國跟中南亞又不同，中國人在這方面對當權者的不滿、對現狀的不滿，恐怕要更激烈，膽子也更大一點。

### 中國人不會接受胡錦濤

現在工人、農民中的維權運動比過去厲害，一年比一年厲害。對他來說，威脅了他的統治，但是用這種辦法就能把老百姓壓下去嗎？你還敢再開槍嗎？事實上他這手是行不通的。鄧小平時代行不通，你胡錦濤就行得通了？

我很奇怪黨內有多少人會真正擁護他？中國人是不會接受他的，他現在看來有點發瘋了。

（大紀元一月三十日訊）

## 胡績偉：關於趙逝世中央四指示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前總編輯和社長胡績偉先生十七日聽到趙紫陽先生去世的消息，奮筆疾書，沈痛地要求中共黨中央為趙紫陽舉行公開追悼大會，並為趙紫陽平反昭雪。後來，他收到中共中央傳達的四點指示，寫了一篇文章闡述了趙反對「六四」鎮壓沒有錯的理由，並指出中共指示的種種謬誤和中共處理趙紫陽問題的錯誤。

胡績偉於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三年期間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擔任全國人大常委及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他因反對「六四」屠殺而被免除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的職務，留黨察看兩年，遭長達十幾年的壓制。

大紀元記者致電胡績偉先生位於北京的家，八十五歲的胡績偉先生耳聾很難聽見，他的夫人代為發言，讀了胡績偉於十七日聽到趙紫陽去世消息時給中共中央上書的一封短信。隨後記者採訪了胡績偉的好友、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先生，李普先生介紹胡績偉先生這兩天又寫了一篇題為〈沉痛悼念紫陽同志〉的文章。李普說因當局嚴密封鎖，此信一直無法傳出，他希望記者幫助把它公諸於世。

下面是胡績偉先生所書全文。

沉痛悼念紫陽同志

趙紫陽同志含冤逝世，我十分悲痛，我是十七日早八點鐘得到這個噩耗的，十點鐘我就寫了一個很簡單的意見，我把這個短



短一百多字的意見抄在這裏：

黨中央前總書記、國務院前總理趙紫陽同志在長達十五年的軟禁以後於今天含冤逝世，這是舉世震驚、全國悲痛、萬民哀悼的國殤。紫陽同志的偉大功勳將流芳百世、名垂千古。

我沉痛地要求黨中央為紫陽同志舉行公開的、隆重的追悼大會，為紫陽同志平反昭雪。

胡績偉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

到了十八日上午九點，老幹部局來人向我傳達了「上面」的幾句話：

「趙紫陽對黨和國家是有功的；」

「趙紫陽在『六四』時是有錯誤的；」

「黨中央對他的處理是正確的；」

「黨員要同中央保持一致。」

這個指示來得太晚，在二十二個小時以前，我的意見早就發出去了。

我認為「上面」的四點意見，第一點是對的。紫陽同志不僅有功，而且是赫赫的功勳。

第二點是不對的。因為在「六四」鎮壓前，趙是堅決反對壓制群眾，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他為了表明堅決反對武裝鎮壓而宣布辭職。鄧小平調動幾十萬國防軍，宣布首都軍事戒嚴，用坦克和機槍鎮壓手無寸鐵的青年是十分錯誤的；主張用民主和法制的和平方法解決問題是正確的，趙紫陽當時沒有錯，是鄧小平錯了。

當時反對武裝鎮壓的還有七位將軍（張愛萍、肖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也強調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不能對著人民群眾。

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幹部會議上講話時就說過，對待「群眾鬧事」不能鎮壓，他說：「有些同志手就有點癢了，想去壓，這一套我們過去相當有一套。學會了一套，就是對付階級鬥爭，把那個辦法搞出來了。還是軍法從事吧，用簡單的辦法。或者不是調兵，就是用行政命令，看不順眼的，就把他壓一下。中央認為這樣不好。壓是壓不服的。」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還說過：「不要怕鬧，鬧得越大越長越好，七鬧八鬧會鬧出名堂來的，可以弄清是非。不管怎樣鬧，不要怕，越怕鬼越來。但也不要開槍，什為時候開槍都是不好的。」

毛澤東這裏說的是「什為時候開槍都是不好的」。可見，鄧小平下令開槍是錯的。七位將軍反對開槍是對的，趙紫陽反對開槍也是對的。怎麼能說趙反而錯了昵？

「上面」這次說：中央對趙紫陽的處理是正確的，我認為是不正確的。因為趙沒有錯，而且有大功，為什麼要把他軟禁起來，一直軟禁到死？退一萬步說，就算趙有錯，也應當按黨章處理。黨章第三十九條規定：「黨的紀律處分有五種：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的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

黨章沒有軟禁黨員的規定，更沒有「無期軟禁」的規定。所以，當時和以後的黨中央把紫陽軟禁了十五年，一直到死，這是違反黨章的，怎麼能說中央違反黨章是正確的呢？

法律規定，任何人犯法，只能由司法機關依法審理以致判刑，任何機關、團體無權私刑拘押，更無權非法監禁。那麼，中央長期軟禁趙紫陽，這是犯法的，怎麼還能說是正確的呢？

再說，胡錦濤同志上任以後，一再強調依憲治國，新中國歷屆憲法的基本原則是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得侵犯。那麼，趙紫陽是我黨的總書記，他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這還是正確的嗎？這就是依憲治國嗎？

再說，紫陽同志被非法軟禁十五年，在他生命垂危的時候，仍然沒有得到起碼的人身自由，這符合共產黨的起碼的道德準則嗎？難道這樣違反人權、違反人性、違反道德的行為，還是正確的嗎？

所以，我認為中央違反毛澤東的教導、違反黨章、違反現行法律、違反憲法、違法人道的行為是錯誤的，是不能強迫黨員同他保持一致的。

（大紀元一月二十二日訊）

## 高文謙：處理趙後事 中共玩騙招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高文謙先生是前中共最重要的官方史學家之一、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組組長，參與編寫中共官方的《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等書。也是《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書中披露了大量歷史文獻檔案和採訪當事人的談話記錄，其中有不少是中共當局諱莫如深和首次面世的，在許多問題上顛覆了官方長期以來的說法。

高文謙後來赴美，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華盛頓伍德·威爾遜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

記者：中共對趙紫陽後事的處理以及評價，不知您有何感想？您對這整個過程怎麼看？

高文謙：和我原來預料的差不多，因為我是從共產黨體制內出來的，瞭解他們。大陸官方前段時間搞的所謂「鬆動」，做了某些「讓步」，都是非實質性的，僅僅是個策略上的手法而已。共產黨不是經常講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嗎？在處理趙紫陽的喪事這個問題上也表現了這種手法，所謂的原則性，就是說對趙紫陽問題的定性絕不退讓半步。

前段時間，海外的某些媒體出來幫閒，不斷放出風來，散布說官方讓步妥協。實際上這是一個騙招，哄騙趙的家人，讓他們合作，把遺體告別儀式的主導權掌握在官方手裏。因為趙紫陽的家人是遺體告別的主角，沒有他們的配合，這個戲就唱不下去，

完全由官方唱獨腳戲的話，世人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問題。所以他們必須要讓趙的家人來配合，怎麼能讓趙的家人配合呢？於是便製造假象，放出一些風來，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另一方面，大陸官方放出這些風來，也是為了矇騙國際輿論，轉移國內的民眾和海外的華人的視線。但實際上從一開始我就覺得無非三種可能性，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一步不讓，事實果然不出所料。這一點也是由共產黨的本性所決定的。

為什麼不會讓呢？原因就在於趙紫陽問題是中共的一個死穴。因為如果還了趙紫陽一個公道的話，在追悼儀式上恢復他的名譽，問題馬上就接踵而來。第一，究竟是誰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軟禁趙紫陽十五年，一直把人關到死？要追究法律責任的話，從鄧小平開始，中共三代領導人都逃脫不了，他們都對趙紫陽欠下了帳。鄧小平完全是沒有任何法律程式的情況下，就憑他的個人意志，硬這麼定，硬這麼幹。就如同他對「六四」鎮壓一樣，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將來也要受到歷史審判的。鄧小平有兩個大過，一是「六四」鎮壓，另一個是把趙紫陽囚禁至死，製造了中共版的當代「張學良」。這筆帳是一定要算的。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不折不扣地繼承了鄧小平的衣鉢，繼續關押趙紫陽，毫不鬆口，一直到他兩年前下台。

胡錦濤上台之初，如果高明而有政治眼光的話，完全可以對趙紫陽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用年邁體弱多病這些人道主義的理由，解除對他的軟禁，這樣他們就主動多了。這樣做，完全可以不涉及到任何政治上的評價，不涉及到對他問題的定性，但是先把趙解脫出來，還他一個自由身，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說胡溫是一錯再錯，從那個之後呢，就很難辦了。

在趙紫陽走了之後，本應借此機會還他一個公道，在舉辦喪儀的時候講點好話，這符合人之常情，符合中國人的倫理道德。但是中共官方一開始態度非常強硬，就是一句話的新聞，然後強力壓制，結果引起海內外反彈，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各國政府表態，高度評價趙紫陽，使中共面臨很大壓力。另外，中共黨內也很不滿，感到不平，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得不做了某些策略性的讓步，放了很多風，但是骨子裏是一點沒有變。

記者：您對新華社發的那篇新聞稿怎麼看？

高文謙：新華社發的那條消息雖然沒有在遺體告別儀式上公開去念，但實際上效果是一樣的，就是當眾給趙紫陽潑污水。這條消息是在遺體告別儀式還沒有開完，大約是開始一個半小時之後就發了。這說明是迫不及待呀，這和在遺體告別儀式上宣讀沒有什麼兩樣。趙紫陽當年拒絕鎮壓，根本不是什麼「嚴重錯誤」，而是趙紫陽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稱頌的地方。

姑且先不論這些，就說按照中國的倫理道德裏「為死者諱」的傳統，也沒有必要在喪儀上作這種文章。由於任何非官方的媒體都不許採訪遺體告別儀式，新華社發的消息是獨家新聞，影響很壞，突顯中共官方為了一黨之私，一意孤行，什麼都可以幹得出來。中國有「死者為大」的傳統，但是他完全不顧忌，就是他們一定要把趙紫陽摀下去。它玩弄的不過是策略的靈活性。我非常理解趙紫陽的家人在這個過程中處於一種無奈、悲憤的情況。

說實話，我當時心裏頭是有所準備的，這些人是不會做出真正實質性的讓步的。但是它居然事先還在媒體上放了那麼多風，

許了半天空頭支票之後，然後居然變了個手法，沒在遺體告別儀式上宣讀趙「犯有嚴重錯誤」，但是遺體告別儀式還沒有結束，就迫不及待地在媒體上發表。這種玩弄死者家人的做法實在是卑劣無恥，也真是叫我開了眼了。雖說思想上有準備，但還是感到「悲憤莫名」，這是我看到新華社消息時的感受。

記者：您覺得這件事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高文謙：從中共官方發出去的新聞稿，可以看到，實際上它早有決定。新聞稿裏面埋了很多釘子，要細細說出來，有幾大釘子，我準備寫文章把它揭露出來。總的來說，它根本不想做出任何讓步。這對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溫在形象上是個極大的傷害，人們就不會再相信他們所標榜的「以人為本」、「依法治國」那套鬼話，連自己的總書記趙紫陽都不能善待，你能夠善待普通的老百姓嗎？誰能相信呢？在這次悼念趙紫陽的活動中，趙紫陽家鄉河南的一個老鄉自己戴一朵白花去悼念趙紫陽，眼睛就被打爆了，真是慘不忍睹啊！露出了一種赤裸裸的殘暴的真實面目。血寫的事實沒有辦法用墨寫的謊言掩蓋，這回看得非常清楚。

中共對趙紫陽處理的這件事上，使得胡溫上台後一直在鼓噪的所謂「新政」破產。你想，這種「新政」難道就是這樣對待自己的人民嗎，就是這樣踐踏起碼的人道嗎？這一次中共是舊債未還，又欠新債。這就是共產黨的本性，別人是改變不了的。如果繼續這麼走下去，做為一個執政黨，要把中國引導到什麼方向上去，是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的。

記者：您覺得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嗎？還是會有後效應？

高文謙：我覺得事情還沒有完，目前壓下去，只不過是一種

暫時的過關。中國有句話叫「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中共官方在趙紫陽喪儀的問題上連哄帶騙，軟硬兼施，應付過關。但是馬上緊接著就是四月五日的清明節，六月四日的周年，這些都是敏感的日子，都是和討還趙紫陽公道、恢復趙紫陽名譽連在一起的，就算今年能過去，還有來年的祭日呢。

所以可以說，中共當局一方面可以採取強硬手段，殘民以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們自己坐在火山口上，整日提心吊膽、心驚肉跳，沒有一刻可以安穩。所以這種日子也很不好過。

目前由於中國大陸整個經濟形勢發展速度還比較快，很多中國社會的深層矛盾暫時被掩蓋住了。一旦經濟發展速度降下來，就要「水落石出」，各種問題就要充分地暴露出來，而且更加尖銳化。那個時候就不是一味的強力壓制就能夠奏效的，所以中國還有一段苦日子要走呢。

記者：很多人說，中國的老百姓有個遺忘的慣性。雖然經歷過一次次的迫害、謊言，但還會重蹈覆轍般地繼續麻木。您怎麼看呢？

高文謙：這也是中國人的悲哀，非要刀架到自己的脖子上後才覺醒，否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但是，中國有良知的人就是要和這種遺忘做鬥爭。我是搞現代史的，實際上就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還老百姓的知情權，與中共官方強迫老百姓遺忘，製造集體失憶症做鬥爭，你們新聞媒體實際上也是在做同樣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事實真相告訴老百姓，喚起國人起來鬥爭。今後的道路仍然任重道遠。

（大紀元一月三十一日訊）



## 王軍濤：趙去世將產生深遠影響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十七日早晨病逝，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了王軍濤先生。他表示，中共領導人都知道一九八九年錯了，但他們沒有勇氣和魄力去糾正，中共總是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前一個錯誤，一直走下去，直到發生一個根本性的政治變化，趙紫陽的去世對中國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王軍濤出身於將軍家庭。一九七六年在「四五」運動中，十七歲的王軍濤因四處講演及在天安門張貼四首自己創作的詩歌而被捕入獄。「四五」事件平反後，他獲選為共青團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七八年王軍濤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在西單民主牆時期，他與周為民、陳子明等人創辦《北京之春》。一九八六年陳子明創立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王軍濤擔任該所負責人之一。

八九民運中，王軍濤被各界推薦參與「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工作，協調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北京知識界自治聯合會等組織的合作，因而被中共視為八九民運黑手，以「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通緝，一九八九年十月王軍濤被捕，一九九一年二月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

北京當局迫於國際壓力，一九九四年四月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直接將王軍濤送往美國。他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中國「六四」真相》一書英文版《天安門文件》的編輯黎安友教授，獲得政治學博士。

記者：您是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的知名人物，能談談您對趙紫陽先生的評價嗎？

王軍濤：這得回到那個時候，給我印象最深的，五月中下旬學生絕食的時候，他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他拒絕軍隊戒嚴、鎮壓學生運動，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將完結的時候，他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哽咽地說：他來晚了。那時我看到電視的時候，心裏也說：確實來晚了，而且這個黨也來晚了，所以才造成這樣大的運動，而且還導致了學生要死的那樣的代價。

那個時候，我覺得，雖然來晚了，但是從那個時刻起，趙紫陽就與我們站在一起了。應該說，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們與趙紫陽不是一個陣營的人，我們是希望中國能夠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而趙紫陽在前半期主要是做經濟改革、經濟建設，而在後半期，集中在政治改革。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確定要開始鎮壓，以及隨後的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這三任領導人，使我今天回過頭來看十五年前的趙紫陽，我就深深地對他感到一種敬佩。那個時候只是覺得他和我們站在一起，也佩服，不像今天這樣佩服。今天我的感覺就是：實際上他那時候並沒有來晚，在整個的共產黨的陣營中，特別在中國共產黨中間，他是來得很早和最早的。特別是有了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襯托，就越發顯得他當時在八十年代做得很不容易、不平凡。

那時候，我們那時還年輕，我們對國家進步的熱情遠遠高出當時的平均水準。也由於這個，趙紫陽當時和我們站在一起，走到我們中間站在一起，他付出了所有的政治生命，而且失去了

十五年的自由，直至臨死前都沒有恢復自由。我覺得這一點非常了不起。

王軍濤哽咽地說：對他的逝世，我們感到很難過。

記者：能認為中共領導人可能給趙紫陽先生恢復名譽，給「六四」平反嗎？

王軍濤：如果恢復趙紫陽的名譽，就意味著說共產黨錯了。哪怕你不恢復名譽，你想不明不白地給人解釋清楚，為什麼趙紫陽不明不白地被剝奪了十五年自由，為改革開放做了那麼大的事情。即使對趙紫陽評價最低的鄧小平也說，對趙紫陽的問題是「支持動亂，分裂黨」。也就是說，趙紫陽的所有問題只是在一九八九年中，一九八九年以前他所做的那些決議，鄧小平說一個字都不能改，就是說趙紫陽主持的工作都是對的。

那就是說，一個即使在鄧小平看來他在八十年代所做的也都是正確的這樣一個領導人，被不明不白地被剝奪了十五年自由。這個怎麼解釋？

所以共產黨的問題在於，對趙紫陽就像對法輪功的問題一樣，就是它犯了一個錯之後，就得犯第二個錯誤、第三個錯誤，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它的第一個錯誤，它就得一直走下去。」

所以趙紫陽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到最後，不到這個社會的政治有個根本性的變化的時候，趙紫陽是無法得到一個公正評價的。

記者：胡耀邦先生去世時引發了「六四」事件，現在趙紫陽先生去世，官方在極力封鎖消息，您認為民間會有何反應？

王軍濤：這個問題也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會不會在趙紫陽

去世時發生像一九七六年周恩來去世時和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時那樣，發生一場政治地震？我覺得這個現在看來不太可能，原因有三點。

第一，趙紫陽確確實實不拉幫結派，他整個資歷和在中央工作的時間不太長，不像周恩來和胡耀邦那樣，在高層有非常深厚的人脈關係。所以在他們逝世時，當民眾自發起來去悼念和反對他們的政敵的時候，高層的領導多數都是袖手旁觀甚至暗中同情和支持。今天的領導人跟趙紫陽沒有人脈上的認同和這種關係，胡溫他們把穩定看得比對趙紫陽的公正評價更重要。

第二，從民間的角度，雖然不滿的情緒也很強烈，但是不像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那樣，在一些問題上有高度的共識。而且精英們又擔心政治穩定，影響他們的既得利益，使得他們不願意去做。

第三，今天的大陸，不像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大陸民眾有一種理想主義，他們願意為爭取一個更好的中國社會去奮鬥，去付出犧牲，今天的人太務實、太庸俗，他們不願意為理想，而也根本不指望這個社會還能有什麼比現在更好，不去想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趙紫陽去世不大可能引起當時像當年周恩來逝世和胡耀邦逝世那樣的政治地震和政治風潮。但是這絕不是說趙紫陽的逝世對中國沒有什麼影響，或者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趙紫陽逝世就表明一個舊的時代結束了，徹底都完了，或者是人去樓空一場大夢終結了。我覺得也不是這樣。因為趙紫陽畢竟是一個政治象徵，這個政治象徵至少標誌著有兩個中國急待解決、但還

沒有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六四」，「六四」是中國人民內心深深的一個隱痛，而且是一個非常大的隱痛。你從中共領導人每年「六四」的緊張措施來看，就說明這個問題如果每年沒處理好，都會出大事。而趙紫陽由於他當時走到學生中說「我來晚了」，而且他後來的經歷表明，他在「六四」受難者中是級別最高的，而且理所當然地成為代表之一，所以趙紫陽的去世又使人們想起了這種不公正。

第二個，我覺得趙紫陽更主要的象徵呢，比較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片面改革和畸形發展的戰略，他代表了一種更全面的改革和發展的戰略，就是不僅要有經濟改革，也要有政治改革，還要有精神文化層面的變革。這種發展道路今天越來越具有重要意義。鄧江兩朝的片面改革戰略已經給中國造成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被排斥在發展的受益之外。而趙紫陽所代表的這種全面的變革思路正在越來越為人們所同意。所以這種象徵意義也會引起人們對他的經久不息的興趣和認同。「所以，趙紫陽的去世，會促使中國人以一種更冷靜、更深刻的方式去思考中國的命運。它對中國的推進，雖然不會像周恩來和胡耀邦去世時那樣造成一時的巨大的政治地震，但是它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記者：歷史上幾位共產黨的領導人，遭受同樣的悲慘命運，被共產黨內部所排擠、壓制，這是由共產黨本身的性質決定的嗎？

王軍濤：政治領導人都有更替、更換，這是正常的。一個黨

也罷、一個國家也罷，領導人都是要更換的。

但是中共的問題就在於它換的程式是不明不白的，換的標準也是不明不白的。華國鋒換下來的時候，在程式上來講，還是得人心的。胡耀邦被換下來，不太得人心，而且標準也不對，因為當初胡耀邦是得到了多數黨員和人民的心，但是他卻被換了下來。而他的那些政敵實際上是不得人心的，反倒成功了。但是胡耀邦換下來的時候，畢竟還保留了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而且可以到各處調查走動，也有人身自由。

而趙紫陽換得既不合程式，標準就更荒唐、更惡劣，他換下來的時候是個黨員和公民，但是竟然未經審判就被不明不白地剝奪了十五年自由，直至臨死前都沒有恢復他的自由。所以，這個問題不在於是否換領導人，而在於換的程式、標準、以及領導人被換下來之後，還能不能享受普通黨員和普通公民應享受的權益。

記者：有人提出，共產黨不能容忍人性的回歸，所以有良知、有道義的人，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的，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普通黨員，都是不能為共產黨所容忍的，您怎麼看？

王軍濤：都是制度造成的問題。人，不管是中國人、美國人、還是世界各國人，都差不多，不同的是制度。當然在同一個制度下，有的人有向善之心，做好人，也有的人做壞人。但是一個好的制度可以使更多的人做好人，一個壞制度使更多的人做壞事，特別是好人在壞制度下也會身不由己，得要幹壞事，做違心的事。包括領導人也是如此。

我認為中國的問題在於共產黨的制度，這個制度導致逆向篩

法，把壞人往上選，把好人往下淘汰，或者使一個人變壞的動機越來越強，做好人的動機越來越弱。

記者：最近很多人表示對共產黨已放棄幻想，海內外公開申明退黨的人也是不斷，各地持續舉行『告別中共』的活動，您對此現象怎麼看？它的意義何在？

王軍濤：這批人做出了有良知的選擇。其實信共產主義的也不一定懂共產主義，那些不信的就更說不上了。跟隨黨走的，也不是那麼堅定。當年，成千上萬的人跟著共產黨，說什麼把自己的腦袋別在腰裏，說什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他說為共產主義而死，表現的很真心，其實他根本就不懂，如果真懂的話，就不會盲目地去信了。

記者：您如何看中共現狀？

王軍濤：中國已經進入後共產主義時期，就是共產黨已經喪失理想主義，已經喪失凝聚人心的力量，現在只是靠利益、利害維持著，早已發生不可逆轉的蛻變，往壞的方向變。我早已不想在共產黨的體制內做什麼努力了。

（大紀元一月二十一日訊）

## 李普：趙紫陽和「六四」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病逝後，一些原中共高官紛紛站出來說話，大紀元記者辛菲北京時間二十二日採訪了居住在北京的原中共高官李普先生。李普表示，趙紫陽選擇了寧願不當總書記，也不贊成用武裝對待老百姓，是一個很負責任的政治家，很偉大的政治家。「六四」這樣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幹，北洋軍閥不敢幹，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北京不敢幹，國民黨的軍隊也不敢幹，唯有共產黨的軍隊這麼幹。

今年八十六歲高齡的李普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處副處長、北京大學政治系主任、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和副社長等職。李普在趙紫陽被軟禁期間曾經三次前去探望。

記者：您認識趙紫陽，您對他的印象如何呢？您認為他在政治和經濟改革中的作為怎麼樣？

李普：我很早就認識趙紫陽了，六十年代開始就認識了，他到北京當國務院總理、後來當總書記，給我的印象就更好了。簡單地舉幾個例子。

一、支持包產到戶，農民過去沒有耕種的自由、都要由集體指揮、集體布置種什麼、幹什麼，後來安徽幾個農民秘密地搞了包產到戶，自己耕種之後向生產大隊交納了一定數目的糧食和其它作物。這是農村的很大改革，也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趙紫陽那時是國務院總理，支持了這個改革。



二、可以說，他支持了民營經濟，老百姓的私營經濟。他發現了民營經濟可以增加經濟方面的產值，解決就業問題，增加國家的稅收，等等很多方面的好處。

三、提出了對外開放，他那時候在廣東搞了兩頭在外的經濟政策。原材料由國外進來，在國內加工，然後產品銷售到國外，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

四、提出成立特區，深圳、珠海、廈門、汕頭、海南、鄧小平也支持了。這些都說明，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的老祖宗之一、改革設計師之一。

記者：您對他的人品、為人等方面怎麼看呢？比如他在「六四」這件事情上的表現？

李普：他是很好的人，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政治家，中國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就沒有今天的繁榮。「六四」時同情學生，不贊成調軍隊、軍管，慰問絕食的學生，勸他們回學校上課，這都是很好的。他如果贊成軍管，鎮壓學生，那他還可以當總書記的。可是他反對了，那就只有下台，沒有其他辦法。

他選擇了寧願不當總書記，也不贊成用武裝對待老百姓，是一個很負責任的政治家，很偉大的政治家。在這一點上，我是很擁護他、稱讚他、佩服他的。

記者：在黨內像您這樣同情趙紫陽的人多嗎？

李普：在一天天地增加。

記者：您覺得對是否給趙紫陽先生開追悼會這件事情，當局會怎麼處理呢，結果會怎樣？

李普：現在看起來很清楚，當局拿這件事很不好辦。如果承

認軟禁他十五年不對，承認這一條，勇於糾正錯誤，那一定會得到群眾的擁護，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錯了不要緊，改正錯誤就行了嘛。

記者：您對是否給趙紫陽先生開追悼會這件事情，覺得應該如何處理呢？

李普：應該開，而且應該允許發表個人的意見，自由地參加追悼會。現在平反「六四」也不太現實，只要求給趙紫陽平反，這十五年來對他的處理是不對的，按照他的身分，按照總書記、總理的規格公開地舉行大規模的追悼會，做為一種補救的措施，我只要求這兩條。那麼「六四」可以暫時不說，能夠平反「六四」當然更好，但是現在把所有問題一下解決也不可能，可以暫時不提。就是把趙紫陽的問題解決了，給趙紫陽平反，還他公道，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對政府穩定的程度就會大大地加強，順應民心，符合世界潮流。

記者：您覺得如果中央不開追悼會或者堅持說趙紫陽先生有錯誤的話，老百姓會怎麼反應？

李普：很難預言。這樣做是很不正確的，非常非常地愚蠢。很明顯，和人民對著幹，不會有好結果的。

記者：您覺得黨內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李普：持我這種看法的人可以說不少，究竟有多少人，我還不很清楚，但我相信越來越多。我相信自己的主張和看法，因此我希望更多人和我有一樣的看法。如果人們知道真相，同意我意見的人就會更多。假定像我這樣的人能夠公開講話，說明自己的意見、觀點，就會吸引更多的人贊成我。但是在中國沒這可能。

對於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這個言論自由當然應該是指公開演說的自由、而不是個別說話的自由。如果真正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我能夠公開發表我的意見，你不同意我的意見，可以批評、辯論，總而言之，是公開的，而不是黑箱作業，我看一切問題都好解決。

記者：很多人都想去弔唁趙紫陽先生但遭攔阻，有不少人都被軟禁在家中，不讓出門，如劉曉波、劉荻等，鮑彤先生也被阻止弔唁，他的夫人還被推得骨折，林牧先生在西安都被綁架軟禁，您怎麼看這些現象呢？

李普：如果要對我也採取這種辦法或者也把我監禁起來，我告訴你，我毫無辦法反抗。如果誰要把我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我也毫無辦法。但我不會怕他們，也不會屈服。我今天雖然已經八十七歲了，我還是有二十多歲時不怕死的精神。我有準備，準備因為我發表這些言論而被關起來，或者被開除黨籍等等。我可以這樣說，不是吹牛皮，老而彌堅。因為趙紫陽的這件事情實在太可悲了。一個人有幾個十五年？把他軟禁十五年！

記者：在趙紫陽先生被軟禁期間，您去看望過他嗎？

李普：去年他向官方提出來，要求會見他的朋友，要求他的朋友能夠自由地去看他，他也能夠自由地走訪朋友，但遭拒絕。像我這樣的，是他的老部下、老朋友、我六十年代就認識他，我可以說跟他有一種很好的關係、老的上下級的關係、朋友的關係。在他被軟禁期間，我去看過他三次，這是事實。我也不過是問問他的身體，看望看望他，覺得他太寂寞，人與外界不能接觸，你說難受不難受？我無非是這樣地去看望他，稍微緩解他

的寂寞而已。我不是做為記者去採訪的，因此也沒記錄，哪年哪月，我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去過三次。

我聽說有兩本書，一本是楊繼繩寫的，這本書我翻了一下，覺得很好。有些事實我可以證明，比如他說，他如果贊成軍管了，他可以繼續當總書記，因為他不贊成，他提出辭職。後來楊尚昆說：你這樣就嚴重了，不要這麼提嘛。他就把信收回來了。但後來就把他撤職了，這些都是事實，我可以證明。

記者：您對「六四」這件事情怎麼看？

李普：大規模的坦克上街，這是古今中外都沒有的。為什麼人們那麼強調「六四」？這是很自然的。「六四」這樣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幹，北洋軍閥不敢幹，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北京不敢幹，國民黨的軍隊也不敢幹，唯有共產黨的軍隊這麼幹，這不是恥辱嗎？所以大家關心「六四」這件事，完全可以理解。

記者：您對新華社做為共產黨的喉舌傳播謊言怎麼看？

李普：別的我不好說什麼，但是這次對趙紫陽去世消息的報導上我很有意見。它說「趙紫陽同志」，趙紫陽原來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這應該說吧？它沒有說，光說個『同志』，共產黨多了，非黨員也可以叫同志，這個說法是不完整的。這十五年他怎麼過的呢？都沒有交待。

但是，這也不能完全怪新華社，據我所知，這一定是上面交下來的，而新華社是奉命發消息。新華社的職能之一就是奉命發這種公告性的消息，這是中共中央命令只能寫這些，不能寫多了，新華社就是奉命發表新聞的機關，它必須聽中共中央的。

（大紀元一月二十四日訊）

## 胡平：悼念紫陽告別中共的重大意義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胡平先生曾獲北京大學哲學碩士學位，一九七九年投入民主牆運動，於民間刊物《沃土》上發表〈論言論自由〉長文，一九八〇年參加自由競選，被選為北京大學海澱區人民代表，一九八三年分到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五年轉至北京社科院，一九八七年一月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當選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先後在《中國之春》雜誌和《北京之春》雜誌主持筆政，現居紐約，任《北京之春》主編。

記者：胡平先生，您好。您認為趙紫陽先生的去世為什麼引起這麼強烈的反響？這其中說明什麼？趙紫陽先生代表了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全球悼念趙紫陽先生的活動意義何在？

胡平：趙紫陽去世引起這麼強烈的反響，這本身就證明趙紫陽的重要性、他的意義。中共先是打算就發個五十六個字的訃告就算了事，但是由於各界的壓力，最後不得不在八寶山舉行告別活動。但與此同時，它戒備森嚴，對異議人士嚴加打壓，中間發生很多很多惡劣的行為，尤其是在新華社發的通訊中，一方面閉口不提趙紫陽擔任過國務院總理和總書記這兩個職務，只是籠統地說「擔任過重要職務」，這麼一件明顯的事實，中共都予以否認，試圖抹殺。另外，還特別一反慣例、違反中國人對死者尊重的傳統，非要寫上「犯了嚴重錯誤」。由此可見，中共當局對趙紫陽的嫉恨和懼怕。

反過來，正是從這一點上，證明了趙紫陽的意義，尤其是中共非要提「犯了嚴重錯誤」，正好說明中共和我們大家最重大的分歧在於這一點上，在「六四」這個問題上，這也就是我們海外各界人士，國內民眾，包括一些黨內人士要悼念趙紫陽，而中共要反對、壓制的根本分歧點。

趙紫陽反對暴力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這一點看起來很簡單，無非就是堅持人的起碼的道德良知。但是我要強調的是，這對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來說是釜底抽薪的，因為共產黨的制度非常龐大，又很複雜，但實際上使這種制度能夠正常運作下去就是它的不間斷的政治迫害。就是說，它不是吃素的，它必須吃人肉、喝人血，它要不吃人肉、喝人血，它就餓死了。

所以趙紫陽反對鎮壓，貌似簡單，實際上是對共產黨的一個徹底的顛覆。比如從東歐發生的情況來看，當數十萬、百萬民眾走上街頭，你當局到底是不是要鎮壓？東歐共產黨的領導人放棄鎮壓，接著就是民主化的開始，一黨專政結束了。羅馬尼亞試圖鎮壓，但是失敗了，緊接著也是民主化轉型。

這一點其實就是關鍵的一點。我們應該很清楚地認識。

有些人容易低估趙紫陽在那個時刻採取那種立場的重要性，或者認為就算當時不鎮壓了，那也不見得就民主了、就自由化了，或者認為，以前也沒有聽過趙紫陽說過很徹底的自由民主的言論。其實在他那個位置上，有這種決定，就是最根本的東西了，這就是中共強權在這一點上不肯讓步的原因，因為他們知道這一步一讓，他們整個專制就崩潰了。

且不說共產黨一開始就建立在暴力之上，特別是到了後來，

它那套謊言早就失效了，也就是說，以前還有人真心相信它那套謊言，到後來人們早就不相信了，它完全靠暴力在那兒支撐著。所以這個暴力系統一旦失靈了，它這個制度馬上癱瘓就死掉了。

所以在趙紫陽這件事情上產生的對立，實際上是人性和反人性的對立、自由和暴政的對立、民主和專制的對立，抓住這一點，就能充分理解悼念趙紫陽的意義所在。

有些人認為，趙紫陽是共產黨的總書記，你們這些很堅定的反對派，怎麼去悼念一個共產黨員呢？當年，戈爾巴喬夫推動蘇聯的政治改革，提出「開放」即公開化，對不同政見採取容忍而不是鎮壓的態度，這一點就確定了蘇聯的改革已經走上另外一條軌道了，走上自由民主的軌道了，與原來的改革就不能同日而語了。蘇聯的沙哈洛夫，這麼著名、這麼堅定的一個異議人士，那時就明確提出表示支援戈爾巴喬夫，這不是他喪失立場，因為他很清楚這一點就是關鍵的一點，他對這個意義很清楚的。

再有捷克斯洛伐克，他們在發生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天鵝絨革命之後，由於形勢發展得很快，十一月十幾日，捷克十萬民眾走上街頭，當局不敢鎮壓，結果開始了民主轉型，不到十天的時間，大家都意識到，現在就該全國大選，該選總統了。最初哈維爾的公民論壇等反對派的組織，他們一致認為他們要推出反對派方面的總統候選人，最合適的人選就是杜布切克，杜布切克是前捷共的總書記，曾經領導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後來遭到蘇聯的鎮壓而被解除職務。當時捷克反對派很清楚地認識到，杜布切克不是屬於共產黨的，是屬於人民的、是屬於自由民主這一邊的。當然，捷克的形勢後來發展就更快了，很多民眾覺

得像哈維爾這樣從來和共產黨沒有瓜葛的人，更值得尊敬，於是大家就推選哈維爾當上總統，但同時，民眾又把杜布切克送上了他們國家的第二號重要位置，選他當了聯邦議會的議長。這就證明，在捷克，這麼堅定成熟的異議運動，他們的領導人、民眾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像杜布切克這樣一個原共產黨的總書記，實際上是和他們站在一邊的，是屬於人民的，這一點是沒有誤會的。我們中國人對這一點應該有很清醒的認識。

而且，還考慮到趙紫陽不僅僅是在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做出這樣的決定，反對鎮壓，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而且他為此付出十六年的被軟禁的代價。在這個過程中，他始終都不改初衷。這個對於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來說，是相當相當不容易的。從他處的位置，反對鎮壓，共產黨就不會再信任他了，鄧小平也不會再重用他了。但是，共產黨又非常願意維持一個表面統一的假象，把趙紫陽當成花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只要稍微有些改變他的主張的表示，稍做一點讓步，承認他以前做得不對，那麼當局一定會給他很優厚的待遇。趙紫陽知道得很清楚，他知道堅持意味著什麼？放棄又意味著什麼？他非常清楚，他始終堅持，至死不渝。這非常了不起。

記者：前段時間，全球的「悼念紫陽，告別中共」形成排山倒海之勢，人們再次對中共的邪惡本性進行深刻的反思。我記得您也參加了，是嗎？

胡平：是的。在紐約。

記者：您認為「悼念紫陽，告別中共」的活動有何重大意義呢？您在參加活動的過程中有何感受呢？



胡平：「悼念紫陽，告別中共」的活動，很重大的意義就在於，實際上就是公開的一場較量，人性和反人性的一場公開的較量。

有些朋友中有一種極端的想法，說趙紫陽是共產黨員，你為什麼去悼念？如果我們大家都抱著這種想法，那整個這個事件就沒有了，那共產黨就輕鬆了，也沒法對他們造成壓力了。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們大家來悼念，而趙紫陽畢竟曾經在共產黨內擔任過最高級的領導職務，還沒給你共產黨開除黨籍，所以才把這個難題擺在了中共當局的面前。如果趙紫陽完全是一個平民，那就自己家裏悄悄處理喪事就行了，報紙上也不用登了，也不存在討個說法、做個評價，是否進八寶山等問題。

我們的活動不是要給趙紫陽在黨內爭得什麼一席之地，更多的意義實際上是對共產黨的一種壓力，對共產專制的一種挑戰。一九七六年悼念周恩來，很多人是借題發揮，周本人並不曾公開反對過四人幫，更不反毛，也不反共，可是我們卻藉悼周反四人幫，藉悼周反毛，藉悼周反共產黨專制。但是我們這次悼念趙紫陽就不是借題發揮。趙紫陽反對暴力鎮壓，堅持對話，堅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些主張也正是我們真正主張的。

趙紫陽已經成為一種象徵，把各種不同處境、不同地位的人，海內的、海外的人，把大家都共同的一點集中起來，包括黨內有民主思想的人、有人道主義情懷的人，和體制外堅決的反共產專制的人，在趙紫陽這件事情上找到了一個共同點。

要想進行一種有效的抗爭，就是要善於找到共同點。每兩個人的想法都可能不一樣，但做任何事情，要取得一種集體的行動

才能產生力量。這就必須找到共同點。

有些事情，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人們找到共同點，同時又構成對專制暴政的最致命的打擊，這就是最好的共同點、最有效的共同點。恰恰趙紫陽這件事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具有這種象徵意義。

趙紫陽去世，中共當局表現得非常惡劣，國際上反映很壞。本來胡錦濤剛上台，西方政府還要觀望一段時期的，這次一下子就把醜惡面目暴露得那麼充分，一下子就引起外界的強烈反感。西方媒體一下子都在批判他們了。這件事情把當局的虛弱、頑固暴露無遺，使民間潛在的反抗情緒也加強了，給中共造成更大的危機。

看中國的形勢，不要通過中共當局怎麼說、而要通過他們怎麼做去判斷。共產黨永遠說：形勢一片大好，老百姓都站在它那一邊的。其實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可以看出，它防民、害怕老百姓害怕得厲害，那就可以看出它是怎麼樣不得人心、在人民之外的，從這件事情上可以做出一個很充分的結論。

我們最近又看到，去年夏秋之交對趙紫陽的採訪，他談到對中共、時局、改革的看法談得更明朗，他說共產黨「沒治了」，這些都非常深刻。事實上，趙紫陽說共產黨「沒治了」實際上就和大家最近所說的「告別中共」實際上是一個意思，就是拒絕共產黨，這種說法一句話就批駁了那種「沒有共產黨，中國就不行了」的說法。實際上中國是因為有共產黨才不行的，共產黨自己改不了自己，自己救不了自己了。

記者：近來海內外不斷有人公開發表退黨聲明，您覺得退黨

有何重大意義呢？

胡平：我們任何想結束共產黨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站出來，和這個黨劃清界限，反對共產黨的這種專制。當然一直有一些人想在共產黨體制內去改變它，一直有這種說法，但是問題在於，趙紫陽的情況不能做為現在這種說法的例證。因為趙紫陽在年輕的時候還真的相信共產黨那套東西而加入的，在後來他才意識到要改變這個黨、改變這個制度，他利用他在黨內的地位和權力這麼去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現在的情況就很不一樣了。你現在明明知道共產黨是錯的、是壞的，你要去加入，加入的第一個效果就是在強化它。你要改變那是以後的事兒，你等不等得著那一天，不知道。你要不爬到很高的位置，就起不到什麼作用，你要得到一個很高的位置，你必須做很多很多違心的、昧著良心的事兒，那說不定做這些事情的過程中自己都給變了，很有可能，共產黨腐蝕了你，使你背叛了你的初衷，這都有可能。

記者：其實就算爬到那麼高，也不一定能夠做成什麼。趙紫陽先生就是一個例證。

胡平：是的。是否能夠爬到那麼高，不知道，爬到那麼高，你能不能不忘本，不知道，如果你爬到那麼高、又不忘本，你做不到，也不知道。

如果我們拒絕它，離開它，那這種行動在當下就是有正面的意義的，而且這種行為也是更多的人能夠效仿的。站在共產黨的外面，不和它同流合污、講真話，這是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能做到的。這種道路、這種選擇其實也是適用於絕大多數人的，即

便沒有最後完全成功，但做的完全是一個正數，不是負數。

這條道路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到的，而只有這個力量強化了，才可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真正發生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共產黨內原來就是一個逆向、反向淘汰的機制，文化革命就走到極端了。「六四」以後，一個有理想、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你要升到高層的機會就比原來更少了，而現在高層完全就是一種機會主義。也正因為此，民間的、黨外的力量就尤其顯得重要。

現在的領導人既不是有民主理念的人，也是沒有信念的人。如果來自民間的壓力小，中共會堅持專制去打壓你，但如果來自民間的壓力足夠大了，他們就不一定敢冒那麼大的風險去鎮壓，很可能就放棄了、讓步了。

一九九八年印度尼西亞發生了一場民眾的大抗議，結果迫使蘇哈托下台。那個時候，印度尼西亞人就有一種說法：如果你是幾個人、十幾個人上街，當局不理你；如果你幾百個、幾千個人上街，當局就要抓你；但如果你幾萬、十幾萬人上街，當局就會和你談判。對於統治者而言，今天的中國的統治者的心態基本上也是這樣的。

所以堅持民間的道路，對我們任何人來說，都是可行的，而且是最靠得住的。

記者：為什麼有的人明知道共產黨不好，還不退黨呢？有哪些可能的心態呢？

胡平：不想退黨的原因那當然很多了，其中當然共產黨本身有很大的利益，它是赤裸裸地靠利益來吸引人。早先，在打天下的時候，還要冒風險的，在五、六十年代，想入黨，還要在平

時的工作中比別人更積極，還要搞好群眾關係，等等，一大堆要求。現在這個黨越來越廉價了，到現在，你只要一表示效忠，那很容易就進入了，完全都是靠利益來誘惑的。

同時，也是因為大形勢、大氣候，養成很多人口是心非，你都不知道他什麼是真的，其實他什麼都不是真的，他也許私下裏跟你說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當然我們也可以想像大的形勢有什麼變化的時候，他們不會去跟專制者殉葬、陪葬。但要沒有這種形勢，或者上頭沒有人要改革，他們很可能就這樣一塊兒昏天黑地混下去，他們未來的前途就不知道去到什麼地方去了。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更正直、更正派的人退黨，除了他們本身的作用之外，也給留在黨內的人造成強大的精神壓力。既然我們都知道這黨不好，我們不在裏頭，你幹嗎還在裏頭？那些有這種想法的，覺得我跟你們一樣，我是想從裏面改變的人，他們就得考慮總得有點表現證明自己說的是真的，你們清白了，那我在這裏頭沒法證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對留在裏頭的人造成一種壓力。

記者：這就是先行者的作用，選擇自己良知的同時，也在喚醒激勵更多的人加入正義中來。

胡平：是的，是一個示範作用。要是沒有人退，大家都覺得還有那麼多好人在裏頭呢，也就是當個黨員不是件丟人的事兒，沒有一種恥辱感和良心的壓迫感，他就更不在乎了。越是有恥辱感，就會越急於擺脫這種恥辱感，想證明自己不是壞人。有這種想法的人越多，也就是在黨內，特別是當高官的人，他就越感到這種壓力，一種良心的譴責，就越有助於他們做出有益的事情。

（大紀元二月十四日訊）

## 焦國標：趙遭遇留下新創傷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焦國標先生是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去年因〈討伐中宣部〉一文，被北大停止授課，研究生的導師資格亦被取消。去年十一月初，中宣部下達正式文件，將焦國標、毛澤東前秘書李銳、作家王怡、余傑、經濟學家茅於軾、農民維權人士姚立法等六名人士，列入禁止見報黑名單。

記者：焦先生，您去參加趙紫陽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了嗎？

焦國標：沒有。我早上七點多出來，準備去八寶山那兒看一下，我也沒有資格進去，因為憑票嘛。結果我都沒有想到，一出我們的樓門，我們學校派出所的幾個小伙子在車裏坐著，他們問我到哪去，我說去看看，他們說別去了。過去從來也沒這樣過。

記者：您剛聽到新華社的消息時，是什麼感覺呢？

焦國標：我感覺在這十幾天內，已經爭取得不錯了，要根據當初發那個五十幾個字的消息，也許連這麼些個字也得不到。

記者：那您覺得是國際社會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是吧？

焦國標：那當然了，肯定是的。我想這個消息應該有兩、三百字吧，起碼比最初的五十幾個字冷冰冰的要緩和了一些。

記者：字數是多了，但大家都很失望，認為不是人們所期望的公正的評價。

焦國標：現在可能還是沒有力量去平衡所謂的保守勢力吧。這十幾天，肯定有不同的力量在做這件事。有的可能希望給他一個好的評價，有的可能希望給他一個不好的評價、維持一九八九

年的評價。我想，可能這兩種力量都在爭取自己的評價，最後停了十一、二天，得到這麼一個結論，那這個結論顯然是沒有能夠改變十幾年前的評價。

記者：您覺得這個結論會造成什麼潛在的影響呢？

焦國標：我覺得影響肯定是會有的，短期內可能也不會有什麼特別具體的一些影響。但是歷史是公正的，他會有他應該有的位置，現在只是各種力量還不夠平衡。

記者：很多人都說，蓋棺論定未能公正，又是一個大悲劇、大冤案。

焦國標：我想主要還是對中國社會方向的問題，對趙紫陽本人來說，對他怎麼評價，就是他活著的時候也不重要了。十多年了，我相信也是看破紅塵了，沒什麼榮辱之類的，給他褒揚又如何？我想對他個人來說沒有什麼大意義，更多的我覺得就是能夠給中國人對民主政治、政治文明有些希望，那現在它不給這個希望，那也沒辦法。

人最後還是活在歷史裏頭，如果他是對的或者代表了文明的方向的話，那麼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之後，我個人認為他身前的榮辱不重要。但對中國社會短期內，顯然如果這一次對「六四」有個好的評價，可能預示著近期會有一個政治上的比較大的改變。但現在看起來是不行了。

趙紫陽十幾天沒有發喪，這個事會成為一個新的話題，關於「六四」，關於趙紫陽，也就是說，「六四」的問題將來很可能還是從趙紫陽的遭遇入手，平反啊，或者給他應該有的評價。因為他畢竟是個代表性的人物，而且他的經歷也很有代表性，而且

這個事兒又給民眾心裏留下一個新的創傷，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大家認為的不公平。

記者：趙紫陽先生的家人對這樣一種結果一定很悲痛。

焦國標：應該沒什麼問題。他家人十五年都接受了。做中國人，你不能受也得受，這就是中國人。對趙紫陽還有家人，畢竟還得活著。那好多人都死了，那不也得受嗎？

記者：有人說，這麼做其實對共產黨本身是不利的，您怎麼看呢？

焦國標：很顯然的，他們是能穩定一會兒是一會兒，比如，他如果有選擇的可能性的話，能明天才發生的事兒，那他就會選擇明天發生。而這正是中國社會目前的問題所在。就是說，以前該解決的問題沒解決，那就會積壓下來，還得解決。中國那些文字自由、出版自由的問題，人家三百年前都解決了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沒有解決。前人失職、沒有解決，那後代子孫只能遭罪。

記者：據有關消息，鄧小平臨終前關於「六四」問題說「留待後人解決吧」，他自己也能意識到那件事不對。

焦國標：他當然知道，他自己做的什麼當然知道，他連骨灰都不留。

記者：明知道不對，為什麼要做呢？

焦國標：那就是讓今天該發生的事情能夠延到明天發生啊。

記者：他們甚至不顧共產黨自身的穩定，也要維持所謂的暫時的穩定。是嗎？

焦國標：殺人對共產黨來說還不簡單了，一輩子殺人多了。對他們來說，影響他們統治的人都不是人，都是障礙、垃圾，沒



有把他們看成是生命。另外，他們可能也有他們的考慮，他們認為那樣做是對他們好的。現在不還在說「六四」鎮壓是對的，才有了現在十多年的平安穩定的時期。現在不還這麼說嗎？他們有他們的邏輯。

我們要說的是，如果那時不用殺人的形式，也許現在的中國比十五年前更好呢。但是這個話說不出來，沒有地方說。而且事實上呢，即便是因為殺了那麼多人，現在這個社會很平靜，經濟繼續維持比較發展的勢頭，我們從道理上講也不能說那個時候殺人是對的，只有劊子手才會是那樣的。

記者：當今的中共領導人為什麼願意背黑鍋？

焦國標：他們知道自己錯到什麼程度，另外也知道自己弱到什麼程度，所以他們才那麼做嘛。

記者：很多人都說，中共這麼做會大大地喪失民心。

焦國標：對趙紫陽的處理，如果是像這樣犧牲了一切，犧牲了人類的公義、公正，犧牲了特別是人類的一種正常的感情、是非，以及政治上的基本信條，這種代價是否值得？到最後了什麼都不講的，政治道德、個人的道德，各種什麼都不講了，已經叫不擇手段了，應付一會兒是一會兒，推遲一會兒是一會兒。

記者：您覺得這件事會使中共在國際上掃顏面嗎？

焦國標：那當然了，但他們也都不講這些。世界上的統治者，像非洲那些國家，我們可能都不知道。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聯合國的合法性問題。我認為聯合國本身就合法性不足，因為聯合國好多成員國本身不是民選政府，有的國家總統殺人、吃人肉的都有。聯合國裏面很多的惡棍，好多的成員國的元首是惡

棍。其實這個世界上惡棍領導的國家還是不少，但是像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領導人的人格不體面的話，那真的是人類的悲哀。

記者：消息說近年來，中共經常在聯合國裏面和一些其他的邪惡的國家聯合抵制正義國家政府的提議，每到聯合國會議，就要派很多人出國四處活動。

焦國標：聯合國關於民主、自由、推進人權的事業，中共都會找一幫惡棍去反對，歷來都這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讓這些國家都糟蹋成什麼樣了。一九八三年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八四年英國退出。為什麼退出？烏煙瘴氣的，成了一個惡棍的俱樂部，成了一個國際政治惡棍的俱樂部，他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裏，所有的投票都是把好的東西投下去了，把新聞自由、人權事業什麼的，只要是好的，他都給你投票投下去，最後變成一個花著美國的錢罵美國的俱樂部。

記者：您提到新聞自由的問題，國內的很多人可能還是不知道趙紫陽先生這件事？

焦國標：肯定很多人不知道，因為他不看報不知道。當時就只報紙上報了新華社那個五十幾個字的消息，而且放在不顯眼的地方。他們幹壞事肯定要幹到底了。

記者：最終人民和歷史是否能容忍中共這樣下去呢？

焦國標：還需要一個過程，春天來需要一天天地來，冬天的冷氣需要一天天地去。

記者：但是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遠了。

焦國標：是的。

（大紀元一月三十一日訊）

## 陳奎德：「六四」趙紫陽光輝的頂點

【大紀元特約記者秦越報導】陳奎德先生說他聽到趙紫陽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的悲痛，因為他沒有等到民主自由在中國實現。他認為趙紫陽最大的光輝，就是「六四」運動中天安門廣場上的最後抉擇，他堅持了人道主義的底線，在人性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上，他站到了人性與文明的一邊，為此放棄了自己的最高權位和自由。如果中共把他最光輝的一點評為是錯誤而不能改的話，中共是在逆人類基本文明的標準而動，那麼中共是沒什麼前途的。

陳奎德先生一九八五年獲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留復旦大學任教，「復旦大學理論工作者聯合會」首任會長。後應邀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兼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應邀赴美，任美國波士頓學院訪問教授。自一九九〇年一月起，陳奎德應聘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並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人文學部常務協調人，《民主中國》雜誌主筆等。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記者：當您聽說趙紫陽先生去世的時候，您有什麼感受？

陳奎德：當然是相當的悲痛，悲痛的非常感慨。我過去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聽到捷克的杜布傑克，當時他是布拉格之春的領袖，他受了二十一年不公待遇之後，到晚年時贏得正義，終於在一九八九年當選了捷克的聯邦會議主席。當時我想起來：「中國的杜布傑克」趙紫陽是否能像杜布傑克一樣，在他有生之

年能贏得自由，能在中國真正地目睹他所呼喚的民主自由在中國實現。不過，這個懸念已經落空了，他沒有等到那一天，所以讓人感覺到非常悲痛。這是我當時的基本感受。另外一個，對趙紫陽的不公和殘忍，是因為某種中國特權色彩，這也令人非常感傷的。

記者：到目前為止，是趙紫陽先生去世第七天，中共依然沒有為他舉行告別儀式，並且在對他的評價上，堅持認為他在「六四」事件中，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定性。您對此怎麼認為？

陳奎德：我想，中國共產黨對此要付出更大的歷史代價，如果堅持要這樣搞的話。如果他想趁趙紫陽去世，順應黨心、民心、全世界的人心，而給趙紫陽公正評價的話，恐怕共產黨在歷史上，還不會留下這麼壞的名聲和下場。但如果要這麼做的話，恐怕很難逃過這一劫的。我想，他們堅持趙紫陽一九八九年的錯誤而不改其結論。這恰恰是趙紫陽一生最光輝的一頁。趙紫陽的貢獻我專門寫了文章談到他的遺產有四點：第一，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取得的成績都是在八十年代的基礎上積累起來的；第二，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受到了挫折，但是他在八十年代體制改革提到了基本的權利制衡的問題、人權的問題，提到了和現在世界潮流相吻合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中國必須要過這個關。第三，我認為最重要的，恰恰是中共認為他是錯誤的，趙紫陽最大的光輝就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最後的抉擇，這是他一生的頂點。當然，人的一生，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也許有錯有對，但在這件事情上，他是堅持了人道主義的底線，也就是說在人性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上，他站到了人性與文明的一邊，這是黑白昭然

的，絕對不容混淆的。趙紫陽放棄了自己的最高權位、自由而站到這一邊，這是他一生中最光輝的頂點，而且是人和禽獸的分別、堅持人類底線最光輝的一面，這點非常重要，是趙紫陽對中國人道主義政治的貢獻。由於這個事件，他進入了現代真正政治家的殿堂，並為中國政壇建立了引人奪目的人道標竿。這是他最大的政治遺產，將來還會在中國政治中起相當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共把他最光輝的一點評為是錯誤而不能改的話，中共一定要逆人類基本文明的標準，逆潮流而動的話，恐怕這個黨是沒什麼前途的。

記者：現在中共堅持阻止那些異議人士、民眾前去悼念趙紫陽先生，並且在媒體上基本不提趙紫陽去世，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黨中央領導人公開去悼念趙紫陽，您認為他們這樣會不會激起民眾的反抗或民主運動呢？

陳奎德：現在的情況和一九八九年的情況稍有不同，現在鎮壓的工具和力量比過去強得多，而且封鎖消息相當厲害。現在的年輕人經過將近十六年的過程，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當時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他們在輿論、消息封鎖上還是相當成功的。即使有很多人非常同情趙紫陽，特別是在海內外知道訊息的，包括年紀比較大的。國際上的政治家及各國也發表聲明，但是中國大批的年輕人不知道，這最活躍的力量不知道的話，恐怕趙紫陽去世的消息受到嚴密的監視和封鎖。所以在中國，我估計不會造成巨大的民變，暫時這段時間、這個難關，中共總會度過去的，據我的判斷。但是這件事情，他又欠下了一筆重要的債，這積累的過程，就像堤壩，不斷的在填補各種各樣的漏洞，漏洞越來越多，

水又積了更高一層，到了將來崩潰的時候，恐怕會造成更大的災難，對黨也好，中國也會有池魚之殃，是相當大的損害，所以說是中國相當大的悲劇。

記者：現在中共黨內也有人提出給趙紫陽先生恢復名譽，給「六四」平反，這些不同的意見會造成中共內部的分裂嗎？

陳奎德：他會引起中共內部的爭議：是否舉行告別儀式、對趙紫陽評價的措詞，都和民眾與中共黨內高層同情趙紫陽的官員的努力爭取有一定的關係，國際的壓力，也使中共的決策稍微合乎一點點人性，不像過去封鎖消息，完全不做任何事情。現在它也終於同意了要做告別儀式，終於在思考最後給趙紫陽定論，這說明了力量的存在對中共還是有影響，但是這影響會使平衡針稍微往好的方向走動一點點，但沒有根本的改變，只是情況比以前有所好轉、有所鬆動，包括對前來悼念的人，這是對大部分的人，除了少數個別被中共嚴厲封鎖的人以外，大部分也都可以去悼念，這也說明中共在這一個方面，還是要受到國內外輿論壓力的威脅作用，我想這也是目前所關注的重點。

記者：趙紫陽和胡耀邦都是深受民眾擁戴的國家領導人，但是為什麼他們倆人的結局都這麼的悲慘？

陳奎德：其實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黨的體制，和黨的基本生態環境所決定的。在中國共產黨裏如果你要堅持基本的人性，堅持一些最常識的，還不是一些很高標準的堅持，若不是以黨性做為最高標準，就是不以中共的利益去壓倒一切、壓倒國民利益來做為一個標準，而是尊重一些基本的人的常識，去尊重基本的國民利益的話，恐怕這樣的政治家在中共黨內都不會有好的下場。

這說明在中共的黨內真正的根本問題是難以改變的，是要動大手術才可能復興的，否則這個黨是沒有前途的。因為一個黨的生態環境都可以從這個黨的歷史中看出來，包括從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先生開始，到後來很多的人像文革的劉少奇、趙紫陽、胡耀邦等等。特別是從趙紫陽、胡耀邦兩人身上可以看到他們是非常人性的，為現在中國的經濟起飛，奠定了良好的貢獻；但遭到如此悲慘的下場，這正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如此的滅絕人性，如此的不符合現代的潮流，也與國際上的基本價值制度格格不入，我覺得他們已經到了絕對要徹底改變的時候了。

記者：您認為中共還有出路嗎？能夠走得下去嗎？

陳奎德：我想中共目前就是趙紫陽去了，胡錦濤來了，但是現在胡正在盡力維護從中國大的方針的掌握，到對趙紫陽先生這些小事的處理，以及對中國大的格局的掌握上，他們都是在進退維谷之間。正在平衡搖擺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左右兩項政治遺產之間，一會偏向毛，如果感覺壓力很大時，一會又偏向鄧。但是毛和鄧雖然在中共黨內確定是兩個參考的信念，兩個基點，兩極的標竿，但是實際上都沒有走出中共的基本傳統，雖然鄧相對於毛，有很大的改進，但是還是沒有走出中共的傳統。

當趙紫陽出現了，現在在他去世之後，逐步的引導到他的政治系統中才能被突顯出來，這是區別於毛的新的政治遺產。就像趙紫陽講，我們十年來的基本經驗，我看一個是資產階級，一個是民主政治，已經知曉市場經濟在中國還是很艱難，現在還沒有得到解決，不過已經朝著這個方向在邁進；但是民主政治是一步也沒有跨出，趙紫陽曾經說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兩者是缺一

不可的，所以這是完全不同於毛和鄧的嶄新的政治座標和政治理念，也是趙紫陽的政治遺產。如果趙紫陽的政治遺產能夠逐漸的為黨內高層所接受，而且成為黨內最高層主流的指導方向的話，我想中國共產黨還是有改變和改革的希望，還是可以走入現代合法政黨的行列的。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共產黨政權已經寥寥無幾，中國共產黨自己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再堅持過去這套法西斯主義，就會在歷史上灰飛煙滅地消失掉。所以在蘇共的共產主義大潰敗之後，中共所有的每一個政府都是臨時政府，每一個內閣都是貪污內閣。與其他們這樣戰戰兢兢、變本加厲地用暴力和謊言來控制中國，遮遮掩掩地把自己的子女、孫子輩都送去美國留學，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留退路，不如效法趙紫陽，把趙紫陽的遺產繼承過來改革這個黨的話，我想還是有希望的。但是目前看來，還看不出這個苗頭。

記者：請問您曾經是共產黨員嗎？

陳奎德：我不是，從來都不是，我連共青團都沒參加過。

記者：現在國內外有很多人公開聲明要退出中國共產黨。

陳奎德：我想這是個歷史潮流，而且這個潮流會越來越猛，中共不要閉著眼睛不看清這個事實，以為只要對內封鎖消息這個情況就不存在了。我想這個情況在未來還是會存在的，如果中國不痛定思痛的話，這樣的發展會成為一個大的潮流。就像當年東德黨內和國內人士大批的出逃，拒絕成為共產黨員，或聲明退出共產黨，在東德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我想中共要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唯一的辦法就是走趙紫陽的道路，過政治改革這一關，沒



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了。

記者：您覺得有希望嗎？

陳奎德：我現在看不出來他們有任何的希望，因為現代的領導人仍在堅持過去的一套搞法，從對趙紫陽的悼念上也可以看出來，他們如此驚慌的來處理這個事件，封鎖訊息，如此的害怕民眾來悼念趙紫陽。所以現在還不清楚這個情況，我想這也不能排除萬一將來中共黨內有健康的力量生成，能夠把趙紫陽的火炬接過來，把趙紫陽的旗子接過來的話，這個黨還有個希望。但以目前來看，我不認為這個黨有任何的希望，如果他們堅持要這樣搞下去的話，只有滅亡這一條路等著他們，沒有其他的道路。

（大紀元一月二十六日訊）

## 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談趙紫陽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十七日早晨病逝，大紀元記者辛菲十八日採訪了著名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先生。

林培瑞早年獲得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博士，是美國漢學家中屈指可數的中國通。一九七二年，有「乒乓外交」之稱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訪美時，他擔任中文翻譯。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間，林培瑞出任美國科學院中國辦事處主任。做為《中國「六四」真相》一書英文版《天安門文件》三名編輯之一，他被中國政府列入拒絕入境的黑名單。目前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的教授。

記者：您可能也聽說了趙紫陽先生已經病故？

林培瑞：是的，對。

記者：您是中國問題方面的專家，您認為應該如何評價趙紫陽先生呢？

林培瑞：這當然不是很容易一句話說完。八十年代初的農村改革，允許中國農民種自己的地，這是個比較大的貢獻。第二呢，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前那一年半中，我認為那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政治上最開放的十八個月，跟他做黨總書記也有關係。他在「六四」失敗，可是他基本上是支持學生，反對暴力，這也是他的積極的貢獻。

記者：您認為趙紫陽先生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有何不同？

林培瑞：這兩個貢獻是比較突出的，一般的其他的領導人，

很難說有那麼好的，尤其是以後的江澤民、胡錦濤，很顯然沒有他的貢獻、沒有他的人格、沒有他的歷史形象。

記者：您覺得為什麼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也會受到共產黨的壓制，被軟禁這麼多年，甚至沒有說話的自由？

林培瑞：因為高層領導人關心幾方面的事情，可是最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力，這是壓倒一切的價值觀，對他來說。所以不管趙紫陽出來是否起作用，起什麼樣的作用，對他們來說都不在話下，他們只是害怕他會影響他們穩定地掌握政權，這是壓倒一切的考慮，所以把他軟禁。相當不開明，可是這當然是個集權政權，他就是那麼思維的。

記者：據消息說，中共方面對是否給趙紫陽先生開追悼會目前舉棋不定，還沒有最後決定，您對此如何看？

林培瑞：這也是因為他們的權力，他們慎重考慮的問題。我相信在趙紫陽過世以前、垂危的時候，他們對這個問題肯定是已經開始討論，而且很緊張的討論，真正是很難的一個題目。因為人家畢竟是他們的黨總書記，你不給他開追悼會，有點奇怪。

尤其是因為前幾天宋任窮，就是現在的官方很喜歡的一個政治局老領導九十六歲過世，很隆重地開了一個很大的追悼會，政治局九個人都出席，江澤民也出席。過了幾天，趙紫陽去世，趙紫陽憑他的貢獻來說，比宋任窮強得多、重要得多，所以趙紫陽過世，他們不開呢，也很難說得過去。

記者：據消息說，共產黨黨內也有一些人提出給趙紫陽先生恢復名譽、給「六四」平反？您如何看此現象，會造成中共的內部分裂嗎？

林培瑞：這我相信。分裂的話，有橫著的和豎著的概念。豎著的概念就是說高層領導也發生一種決裂，像一九八九年一樣，這是很難預測的。橫著分析的話，人的表面意識跟深層的意識之間，我覺得向來都有分裂，很多人肚子裏頭同情改革，同情趙紫陽，但是不好在公開的場合上說，有這種現象。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北京市以內的共產黨的普通幹部裏面，劉賓雁推測大概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同情學生運動，只有少數不同情。我相信這是真的。一直到現在，很多黨內的人不滿那種極權主義的做法，希望能夠有政治改革，但很難出頭，很難抬頭。

記者：為什麼中共這樣的政權能夠統治這麼長時間？

林培瑞：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看過楊建利的散文嗎？他喜歡分析這個問題。暴力是一個方面，謊言是一個方面，還有形成一種官僚制度，官僚裏頭的利益，很多做官的他明知道他做違心的事情，可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就跟著這個制度走，這也是個因素。這三個因素都起作用，是個很大的複雜的問題。

記者：您覺得胡溫會改革走向民主法制嗎？

林培瑞：我看不會主動的。兩年以前，我們都希望他可能會主動採取一些措施，現在很清楚，尤其是胡，他思想相當狹隘、相當保守，想像力不夠，他在五十年代受的那種共產黨教育，是他的最基本的教育，所以他不會的，這是我的看法。

記者：現在中國國內也有很多反彈，您怎麼看？

林培瑞：現在主要不是知識分子，反彈最有效的是農民、下崗工人、法輪功。我贊成繼續反抗。

（大紀元一月十九日訊）

## 程曉農：趙紫陽被誣美間諜未遂始末

【大紀元記者鹿青霜、郭若採訪報導】程曉農先生一九八五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先後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一九八九年起先後到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在美國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博士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採訪時簡要提到趙紫陽被誣陷成中情局間諜，為此大紀元記者做詳細專訪。

程博士首先介紹此一構陷的背景和目的，他說：現在事情過去十幾年了，很多人已經不知道當年在「六四」以後，鄧小平是如何默許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和國家副主席王震，設法構陷，試圖把趙紫陽以叛國罪論處。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減輕中共屠城殺害普通市民和學生這個罪孽的嚴重性，好把整個中共的鎮壓說成是對外國在中國滲透的一種反應。

### 大構陷前的小構陷 關於趙紫陽說明鄧小平垂簾聽政

程表示，「六四」當時鄧小平的身分是軍委主席，儘管他握有太上皇的實際控制力，但在名分上只不過是軍委主席，而按照中國的黨制和憲法，軍隊必須由黨來領導，換句話講，黨才是這個國家的最高負責人，至少名義上對外面是這樣的。

程曉農說，當戈爾巴喬夫在一九八九年五月訪問北京，第一天見了鄧小平，鄧對他說我跟你今天的會見代表了中蘇兩國最

高領導人的會見，這句話讓戈爾巴喬夫非常不理解，當時表示了一些詫異。這個態度讓鄧小平感覺出來，所以鄧小平的女兒當天晚上給趙紫陽打電話，要趙在第二天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專門說明鄧實際上在中國領導人當中有最高的權威，他的話才是最後有決定權的，以便證實鄧小平不是在說謊。後來鄧的親信與鄧家的子女，把這說成是趙要把「六四」屠殺市民和學生的責任推卸給鄧小平，這個本身就是構陷。

### 為使軍事政變合法化 構陷趙是美間諜

程曉農說，「六四」之前鄧小平暗自和一批黨內的元老，包括鄧穎超、彭真、陳雲私下碰頭以後，決定調動五十萬野戰軍包圍北京，不惜以血腥鎮壓來換取共產黨政權的鞏固，這個做法當時是不敢告訴百姓的，甚至是瞞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

鄧小平的計畫是在軍隊進城的當晚五月十六日，召開一次形式上的政治局常委會，通過關於軍隊進城實現戒嚴的命令，形式上背書一下軍隊進城的行動。鄧沒有料到趙紫陽並不贊成這個做法，儘管趙紫陽事前不知道。趙在五月十六日時的態度，包括接見戈爾巴喬夫時候對當時學生運動的態度，使鄧小平覺得趙紫陽可能使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實行戒嚴無法按計畫進行。結果五月十六日的政治局常委會鄧小平沒有敢開，而拖到了五月十七日。

這也是後來軍隊進城以後，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楊尚昆在接見軍以上幹部講話時洩露的天機。楊尚昆說，軍隊是按照鄧小平下達的軍委作戰命令包圍和進入北京，由於五月十六日當

晚沒有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以通過戒嚴令，在沒有戒嚴令的情況下，我們當時進城是非常被動的。

程曉農接著說，五月十六日軍隊進城是在政治局常委毫不知情，無戒嚴令情況下非法進城。按照黨指揮槍這個原則，鄧擅自調動幾十萬軍隊包圍首都，事先不通知政治局，不通知常委會，這本身是違憲，而且幾乎就是一場軍事政變。所以楊尚昆講話所說的被動實際意思是我們實際上是違反了憲法。

五月十九日鄧小平通過逼趙紫陽辭職，勉強通過了所謂的戒嚴令。這件事情表明是把共產黨調動軍隊包圍首都這個政變合法化了，但是它埋下了很大的伏筆，就是這件事情做過以後，中共的國際形象和國內形象基本被毀，所以中共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補救的辦法，讓他們感到可以採納的辦法就是把趙紫陽誣陷成外國特務。如果能達到這個目的，這場軍事政變的性質就可以被掩蓋起來，說成軍隊是為了挽救外國干涉而採取行動。

### **構陷趙是美間諜未遂 因為索羅斯要公布真相**

程曉農講敘，一九八九年七月上旬，當時公安部部長王芳在一個傳達到省市負責人的內部高層會議上做了一個講話。基本內容是：據調查趙紫陽是中央情報局的間諜。根據是趙紫陽通過我所工作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美國的富商索羅斯（George Soros）在中國開設的「改革開放基金會」聯絡，聯絡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政治秘書鮑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曾經和「改革開放基金會」有一些合作項目，包括接受「改革開放基金會」的資助到匈牙利和日本考察。王芳說，索羅

斯的基金會本身是中央情報局的機構，因此趙紫陽是通過鮑彤，然後通過我們這個所，通過索羅斯在中國開設的「改革開放基金會」，與索羅斯聯絡掛鉤。因為索羅斯是為中央情報局工作的，所以趙是中央情報局的間諜。

程曉農說，「當時共產黨並沒有證據，因為本來就是胡扯、瞎編的，但對共產黨而言，這些誣陷是家常便飯，他們也並不在乎。為此我這個所一共有十幾位同仁被逮捕，關在秦城監獄，目的是準備從他們口供當中找到不利於趙紫陽的證詞，然後設法編造構陷趙紫陽的證據。」

這件事情最後被索羅斯本人給破解了。王芳的這個秘密講話洩露出來以後傳到了海外，一九八九年七月中旬美國《華盛頓郵報》的一位華裔記者得到了這個消息，進行了查證後，把這條消息在《華盛頓郵報》上披露出來。

這條消息讓索羅斯非常震驚和憤怒，他寫信給鄧小平明確地說明，第一，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是政府部門，從來只有像他這樣的商人、金融家納稅來養活政府機構，他不可能從政府領取薪水來替政府工作，說他是中央情報局的幹員非常荒謬。另外，索羅斯說得非常明確，他的「改革開放基金會」設在中國，這個基金會本來就已經被中國安全部所控制，因為這個基金會的負責人之一就是當時中共安全部退休的副部長凌雲。如果說這個基金會是中央情報局的機構，那無疑是說中共的國家安全部是在替中央情報局工作，我可以公布真相。

這封信轉給鄧小平以後，中共發現這個故事實在是荒唐，繼續編下去只會讓共產黨丟更大的臉，後來把這件事情悄悄地摀下



去了，趙紫陽也因此擺脫了一場無妄之災。

程曉農總結說，中共在對待黨內高層領導人拒絕服從的情況下，常常會用一種構陷的辦法，栽贓、陷害，殘酷打擊高層領導人，這在共產黨歷史上已經屢見不鮮。所謂黨內的多少次路線鬥爭，每次都是這樣，趙紫陽這次也不例外。

大紀元記者詢問程博士趙紫陽是否會料到他有生命危險，程博士說：「趙紫陽應該想像得到他反對鄧小平鎮壓學生和市民的決定，後果會是非常嚴重的。他不僅僅可能被徹底的剝奪一切，而且可能有生命危險。」

他解釋說：「如果當時公安部按照李鵬和王震指使不顧一切地編造下去，如果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不做報導，或者索羅斯不追究這件事情，向鄧小平說明逼著鄧小平放棄這件事情，趙紫陽就有可能被中共做為外國間諜進一步逮捕，審訊，甚至被判處極刑，這些可能都是存在的，因為在中共與蘇共歷史上，對他們黨的領導人用特務、賣國賊這類罪名整治的已經屢見不鮮。」

（大紀元二月三日訊）

## 明居正：無比悲慘的執政者下場

【大紀元記者陳柏年採訪報導】明居正教授原籍廣東，出生於五十年代國共內戰末期的台灣。一九八六年獲頒美國聖母大學博士學位，是前台灣大學政治系系主任，現任政治系專任教授，也是美國在政治與國際關係領域頗富盛名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學者。目前擔任「大陸民主促進會」負責人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副秘書長職務。他不僅是學界極富聲望的學者，更是中國問題的專家，專精於中共政治、中共外交、國際政治、兩岸關係、政黨與選舉等社會科學研究，論述多次獲得行政院國科會甲種研究獎勵，並於一九九七年榮獲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明教授歷來對中國共產黨惡行的批判與大陸民主化的促進一直不遺餘力；曾於八十年代於美國留學期間，組織策劃了大陸留學生與台灣留學生自國共內戰後的第一次對話會議。而對於遭到中共迫害的法輪功修煉者，更是奔走疾呼振臂聲援；自二〇〇四年起對於胡溫「堅持共產主義路線」的政策提出了一連串嚴厲的批判。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日前在軟禁十五年的狀況下鬱鬱以終。他在生前曾位極中國最高領導人，備受民眾愛戴，「六四」天安門前垂淚為學生執言的畫面仍深植人心。中共對於處理趙紫陽的死訊甚為低調，官方發布的簡短消息中，隻字不提其曾擔任過國務院總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等職，以及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所出的重大貢獻。美國雷根逝世，政府與各國報章媒體尚且熱烈

報導，堂堂中國前任總書記逝世，卻落入不尋常的低調處理。這到底透露出什麼訊息？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做了一個很生動的譬喻，說明中共政權領導轉移的「荒唐性」：倘若今天台灣的陳水扁總統在訪問師大時，意外被捉上台讓師大學生羞辱批鬥一番；之後師大學生再將政權「轉移」給下一位繼任者，或者是美國卡特總統競選失敗以後被雷根逮捕，之後雷根將他秘密送往加州監獄，化名亞當斯，使其受盡虐待身亡。接著雷根又被柯林頓鬥垮，雷根坐飛機逃往墨西哥邊境之際，被柯林頓用飛彈炸毀……。試問在這樣荒謬可笑的統治者領導之下的環境焉能長治久安？人民有何福祉與希望可言？

巍巍中國，正是在這樣一個天性殘暴的政黨手中，摧殘將近五十多年。

### 禍亂的始作俑者——毛澤東

明居正教授指出：「毛澤東晚年尚稱安逸，嚴格地說是壽終正寢、自然死亡，不過很多禍亂是由他而起。」由於毛澤東個人權力的慾望與瘋狂的理念，是中國不幸命運的始作俑者，也為共產黨血流成河的歷史揭開了序幕。

細數毛澤東自從於一九四九年任政府主席以來，為了鞏固政權，先有鎮壓反革命運動，幾百萬人生靈塗炭。接下來的農村土地改革運動，又殺了過百萬的地主。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五年的三大改造運動，死了一批農民，到底有多少人，至今說法不一。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七年的黨內整風，又死了一批知識菁英。然而

真正最荒唐、最可怕的殺人行動，是一九五八年開始的「三面紅旗大躍進」，那就是農業生產大躍進、大煉鋼鐵，以及人民公社，死亡人數高達三至四千萬人，是抗日戰爭的兩倍！至此黨內始有很不一樣的意見，各方聲討毛澤東下台。毛澤東不得已，在一九六一年讓出國家主席之位，卻也埋下中共領導人動亂與鬥爭的伏筆。

### 易名而死的劉少奇

劉少奇與鄧小平是繼毛澤東之後，中國的掌權者。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鄧小平則為國務院副總理。他們兩人對毛澤東所定的一切做讓步政策，使農民有生存與喘息的空間。總算農民苟延殘喘的活下來了，吃飽了之後難免內心憤慨，開始大罵毛澤東過去的政策錯誤。凶殘成性的毛澤東惱羞之下反手整人，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當時董必武、十大元帥等等都不幸遭整，而最慘的乃屬領導人劉少奇。

當時劉少奇是國家主席，受軍隊保護嚴密，暴民所組的紅衛兵動不到他，設計了一個辦法：先綁架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然後假裝她的同學，謊稱劉亭亭被車撞、粉碎性骨折，人在醫院急救。劉少奇不敢去，由太太王光美出面，結果雙雙落入紅衛兵之手。

王光美向來備受江青妒恨。因她是大學校花，曾以國家主席夫人身分出訪各國，會面印尼總統蘇卡諾時備受讚譽，而江青從來沒有以國家元首夫人出訪的經驗。當時王光美被紅衛兵押上清華校園，幾萬人批鬥，把她打扮得像小丑一樣，批鬥的理由千奇

百怪，連名字「王光美」意喻「光大美國」的罪名都用上了。消息傳到劉少奇耳中後趕赴救援，一個泱泱大國的領導人就這樣不明不白，沒有程序、沒有理由的被逮捕了。

劉少奇被逮捕後，一層層送往高層秘密審判。到最後被送到河南開封，於一九六九年死於獄中，隨手安上「劉衛黃」的名字，開立死亡與火葬證明。一位國家領導人，死時竟然連名字都被別人更換了。這就是中共文革十年大難的起源。

### 死法成謎的林彪

文革的時候天下大亂，內戰四起，國家失控的情況下，毛澤東只好出動國家軍隊，全國軍事戒嚴，名為「軍管軍訓」：用軍隊管制人民、訓練人民。前一任的國防部長彭德懷被毛澤東整死了，此時由他所信任的林彪接掌國防部，管理全國，同時憲法明定他是下一任接班人，所以林彪也算是半個中共領導人。

前任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死也值得一提。他是一位戰功彪炳、經歷抗日、韓戰、立下無數汗馬功勞的名將，就因為對於大躍進的建言，被毛澤東長期拘禁獄裏，受盡殘酷迫害致死。

生性毒辣又多疑的毛澤東，在鬥垮彭德懷、提任林彪擔任國防部長以後仍然不放心。現在有一個新的說法是：毛澤東故意逼反林彪。林彪從頭到尾根本不想造反，但是毛澤東到處放煙霧，誣陷他有染指政權的野心，使林彪不得不有所動作，毛澤東好除掉他的勢力。

林彪的死是一個謎。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林彪消失，九月下旬中共才發布消息，說林彪叛國投敵、謀刺毛澤東的事跡敗露，

由此大肆捕捉家人與親信數十人。明居正教授談到他的死眾說紛紜：「一個說法是在牢裏以私刑處決；一個說法是不明原因死於牢裏；一個說法是毛澤東設陷阱，請林彪吃飯的時候再下藥毒死；還有一個說法是請他吃飯的時候，用火箭彈炸毀座車……」。中共官方的版本則是林彪搶奪一架三叉戟的客機逃往蘇聯邊界，不明原因墜毀。」總而言之，他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在中共悲慘的領導人行列裏消失了。

### 未受妥善醫治的周恩來

毛澤東下一個整人的對象是周恩來。周恩來在黨裏的地位比毛澤東還要高。一九三五年的時候周恩來就位居共產黨的一號人物，後來也是二號至三號人物，但是從不掛名一號。文革時他的身分是總理，相當於現在溫家寶的位置。

為了奪權，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間，毛澤東想盡辦法鬥他，但是周恩來總能化解。然而最後畢竟未沒能全身而退，因癌症身亡。流言傳說他的癌症本來可以治好，但是後來被毛澤東與江青調換了醫療小組，用了一些治不好、無效，甚至是有毒的藥物。按照歷來中共對待批鬥對象的手法，這種說法十分可信。所以周恩來的死也並非完全正常。

鬥垮了劉少奇、鄧小平、林彪以及周恩來這一幫人以後，毛澤東壽命已盡，便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帶著滿身的罪孽死去。

### 繼承惡劣路線的鄧小平

毛澤東去世以後，華國鋒繼任為接班人。他集結黨、政、軍特的大權於一身，表面上呼風喚雨，其實基礎與人脈都不足，正好讓鄧小平有機可乘，寫信央求華國鋒讓他回來。在敵不過黨裏的壓力下，華國鋒重新起用鄧小平。可想而知的，延續「恩將仇報」的共產黨本性，鄧小平想盡辦法鬥垮華國鋒。如此狠狠鬥了三年，終於在一九八〇年將他的勢力完全拔除，只剩下幾個空頭位置。如今華國鋒已為八十幾歲的高齡老人，在黨內久無聲跡。明居正教授透露一個消息：「聽說華國鋒曾要求退黨，但是消息未經證實。」

### 鬱鬱以終的胡耀邦

鄧小平接下來扶植胡耀邦與趙紫陽，將胡耀邦拉做黨主席，使趙紫陽為總理。胡耀邦是共產黨中比較開明、人性尚未完全泯滅的領導人。由於他的政策略為開放、眼光較為遠大，自然與鄧小平有所衝突。到了一九八七年，鄧小平終於忍不住了，逼使胡耀邦下台。胡耀邦的下台也是莫名其妙，完全沒有公開程序，就在鄧小平個人的小組會議裏免除職權。他在下台之後被軟禁在家，最後鬱鬱以終。

### 軟禁十五年的趙紫陽

接下來鄧小平提任趙紫陽為國務院總書記。據說當時趙紫陽詢問他的智囊要不要接這個位置？智囊忠心勸諫：「還是不要吧。我們黨歷來的一號人物，不論是黨主席或是總書記，沒有人活得好的。」然而趙紫陽在權力中樞已是騎虎難下，明知此去前

途難卜，也只有硬著頭皮坐上總書記的位置了。

一九八七年趙紫陽接手黨務以後，小心翼翼的進行職權。然而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的死亡引發民主運動，天安門前每天都有百萬遊人遊行示威。官方內部為了如何處理，在決策上有了分裂的意見：趙紫陽一幫贊成民主對話、溫和處理，李鵬與鄧小平卻認為屠殺才是唯一的辦法，唯有殺人才能鎮得住這批手無寸鐵的良民與學生。兩派鬥爭之下，趙紫陽被拔除職權。當趙紫陽知道自己大權旁落，將有大規模的血腥鎮壓，才有五月十九日那天垂淚面對學生的一段話：「我已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啊，來日方長！」

### 本性邪惡的共產黨

最後，明居正教授為中共領導人的下場做一個總結：「從共產黨的歷史看來，除非心狠手辣、泯滅人性如毛澤東、鄧小平者，才可安享餘年，否則無法獲得善終。這也是因為共產黨是一個本質邪惡的黨派，稍有慈悲心腸的人很快就被淘汰，留下的則是符合其殘暴恐怖的標準者。」

細數中共領導人，姑且不論肉體生命在激烈鬥爭中的衰敗，至少政治生命都非常悲慘，沒有幾個人能夠好好的在任期內安穩坐完他的位置。這是根源於中共政黨本質的邪惡！如果本質不夠邪惡、都會被這個黨嚴酷淘汰，換上更為凶殘的劊子手。即使是位尊億萬人之上的領導人，也難逃如此悲慘的下場啊。

（大紀元二月十四日訊）



## 林牧：趙去世將引震動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今年七十七歲的林牧現居西安，曾任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秘書、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陝西省委副秘書長、國務院科技幹部管理局局長、中共西北大學黨委書記。文革期間曾受到長達十二年的政治迫害，曾兩度入獄、兩次被開除黨籍、八年勞改。一九八九年，林牧在北京參加和支持學生民主運動，「六四」事件後第三次被開除黨籍，從此不再擔任任何行政和學術職務。一九九五年，被推選為「中國人權」國內理事，一九九八年改任榮譽理事。在國內外發表思想、言論、紀實、雜文與詩詞約五十萬字，所主編的《中國風俗》叢書三十卷，先後在西安、台北出版。

### 在中國引起的震動將不可估量

林牧：這件事情在中國引起的震動將是不可估量的。

這件事情對於當局是一個難題，是不是要治喪、追悼，如果治喪、追悼，對趙紫陽的評價怎麼講法？當局完全不理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形式就是：不太隆重的、降低規格的治喪、追悼，迴避「六四」事件，這種可能性比較大。」但是他們迴避不過去，因為這件事情在趙紫陽一生中是最大的事件，也是他最光彩的地方，這是迴避不了的。迴避「六四」事件，中國人民是不會同意的，老百姓是不會答應的。

如果當局持一個很不公正的態度，那一定會激起全國人民的反抗。這對他們是一個考驗。中共領導人到底是站在人民的一

面，還是反人民的一面；是站在進步的一面，還是反動勢力的一面；是為民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還是反人民的。

現在民間積怨很深，和當局的對立很嚴重，如果這件事他們不正確處理的話，那各方面的矛盾都會激化，因為這件事情確實是太不公正了，中國當局做的太不公正了，和張學良相比，趙紫陽對中國的貢獻遠遠超過張學良，但他所受的不公平對待也遠遠超過張學良。

### 胡耀邦和趙紫陽功勞最大

林牧：對趙紫陽先生的評價，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當中，做為領導人，功勞最大的就是胡耀邦和趙紫陽。趙紫陽反對鎮壓人民，最後犧牲了個人的地位、權力、甚至個人的自由，來保護人民，這是一種偉大的風格，偉大的人格。在歷史上是會永垂不朽，名垂青史的，中國人民會永遠地懷念他，感謝他。

### 退黨就是最嚴重的抗議

林牧：最近海內外的退黨熱潮這件事要發展下去，那當然影響力就很大。中共許多老的黨員完全失望了，退黨就是最嚴重的抗議了。像我們這些人不用退黨了，我們早就被開除了，像鮑彤和我這一批人，早被開除黨籍了，我們根本用不著退黨了。我被中共開除了三次。

### 前趙紫陽秘書鮑彤現況

鮑彤曾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政治局常委秘

書、前中央委員、原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被秘密逮捕，一九九二年三月，被中央政治局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開除黨籍，七月，被法院以同樣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七年。鮑彤服完刑期被釋放後，一九九八年起公開為趙紫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呼籲。

林牧：鮑彤刑滿以後又關了一年，每天有十幾個安全人員輪流看管，就在他的家裏設立了監管他的辦公室，其實還是被「軟禁」，他原來是正部級幹部，已被開除了黨籍、公職。

鮑彤生活很艱苦，出獄後，當局每月只給他發五百人民幣的救濟金。但是他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資助，包括朋友的。他去年才有了一台舊電腦，但是經常被防火牆封死。電話經常不通，現在已經打不通了。

（大紀元一月十七日訊）

## 包遵信：中共的處理擴大社會矛盾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包遵信先生原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走向未來》叢書、《中國哲學》等雜誌主編、顧問，在《人民日報》等報刊雜誌上發表中國思想史方面論文約百萬字。參與八九運動，被指控為「黑手」，是「六四」後中共最早通緝的學者之一，一九八九年六月被捕，被控「反革命宣傳罪」，一九九一年一月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五年，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獲假釋。出獄後，除了從事研究、寫作之外，一直參與人權活動。曾出版過《民主與啟蒙》、《「六四」的內情》等書籍。

記者：海內外對趙紫陽先生的事情非常關注，我們大紀元也一直在持續做採訪，希望把民眾的聲音反應出來。您在「六四」過後是被通緝的七位知識分子之首，對「六四」的體會應該很深。不知您有什麼想跟大家談的嗎？

包遵信：對趙紫陽的評價肯定是錯誤觀點。說他在一九八九年犯嚴重錯誤，這就是從一九八九年以來官方最錯誤的觀點，實際上根本站不住腳的。他並不是犯錯誤，而是表現了一個中國領導人的英雄氣概。所以這個正好要顛倒過來。將來這個一定要翻過來的。

記者：您以前與趙紫陽先生有過接觸？

包遵信：我和他沒有任何私人關係。趙紫陽極為堅持自己的信念，要跟上世界民主潮流，對社會矛盾不是動不動就說什麼

「動亂」，而希望通過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很了不起！他寧可不要自己的權位，也要堅持自己的理念。在現代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需要很多人做出犧牲的，趙紫陽就是其中一位。

記者：為什麼趙紫陽先生被囚禁了十六年，現在還這麼受人關注和敬重？

包遵信：這說明中國還有希望，老百姓還關心這個事情，人性還沒有完全泯滅。

記者：您覺得共產黨為什麼要違背民心民願來處理這個問題呢？

包遵信：這是一個利益問題了。我覺得中央這幫人是代表既得利益者集團。什麼都沒有，就是利益。一代一代傳下來，他們認為就不能翻案。

記者：這個事情會有什麼影響呢？

包遵信：肯定擴大社會矛盾，你就看看吧。現在的社會矛盾大著呢。

記者：有很多人表示對共產黨放棄幻想了，不知您怎麼看？

包遵信：是的。我也被抓了。我是趙紫陽去世這段時間，從十八日到二十七日晚上，我都被軟禁在家裏，不讓我動，門外有幾個警察看管。

記者：在海內外一直都有人退黨？您以前曾經是共產黨員？

包遵信：對，我曾經是。後來在「六四」後被開除了。它開除我很好，我非常高興。

記者：為什麼呢？

包遵信：你說做這個黨員有什麼意思？

記者：您認為中國的出路和希望在哪兒？

包遵信：要政治改革，要邁向民主化。

記者：您覺得現政權能走向民主嗎？

包遵信：不可能，至少目前看不出這種跡象。

記者：您覺得政治改革具體如何操作？

包遵信：逐步改革，一下子來對國家、民族也沒好處。逐步地開放言論。大家心理有氣、有話，要說出來。怎麼走向民主化，大家有什麼建議，都能說出來。這點都做不到，怎麼行呢？

記者：有人也提出，趙紫陽這件事情也反映出，黨內無論是普通黨員還是領導人，只要他有良知、有人性，共產黨都不能容忍。

包遵信：對，就是黨性泯滅了人性。

記者：這是否也是由共產黨的本性所決定的呢？它不能接受好、正的東西？

包遵信：是的。

（大紀元二月六日訊）

## 余英時：趙像王安石想改革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余英時先生師從錢穆、楊聯升二位國學大師，以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名聞學界，治學博大精深，被譽為當代世界級中國史大師。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他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現代儒學論》等。

二〇〇四年十月十六日，一批中國研究學者和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舉辦「趙紫陽與中國改革」研討會，余英時為研討會親筆書寫了一幅賀詞，特別提到趙紫陽的行藏風骨足以追步荊公王安石。

在大紀元記者一月十八日的採訪中，余英時表示，趙紫陽是共產黨裏面有誠意改革的一個人，在開放經濟、政治改革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天安門之後，他自動地寧可被解職、寧可被軟禁，他也不屈服，這是很難得的。他是像王安石一樣想改革的一個人，但是大環境使他不可能改革，而且後來受到迫害。

余英時認為，共產黨領袖垮掉後，沒有一個受到好待遇的，這是不奇怪的，從陳獨秀開始就如此。中共唯一害怕的是黨的威信失掉了，他們就完了。他們現在一心一意就是要維持黨的統治，一黨專政不會動搖，這是它唯一的目的，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不在考慮之內。

余英時認為中共不可能給趙紫陽先生恢復名譽和給「六四」平反，這個黨要抓住權不放的，只要任何東西影響他的權力，它就會全力抗拒的。余英時表示，看不出胡溫會改革走向民主法制的任何跡象。

對於有人認為沒有了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余英時表示，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才出現，一九二一年前中國不是已經存在了五千年了嗎？所以這個問題不用答案了嘛。

（大紀元一月十九日訊）



## 馮蘭瑞：趙紫陽後事與中國局勢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今年八十五歲的馮蘭瑞女士曾任中國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副所長，在《晉察冀日報》、上海《青年報》、《中國青年報》、《哈爾濱日報》和《經濟學週報》任編輯、總編輯、社長。近二十年發表論文二百多篇、專著五部，主編書籍六部，共約三百五十萬字，自一九八三年始列入世界多種名人錄，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現居北京。

記者：馮女士，您好！我是美國大紀元時報記者辛菲，因為最近趙紫陽先生這個事海內外都非常關注，不知您可否談一談？

馮蘭瑞：趙紫陽去世是一件大事，這個事好像是過去了，但是並沒有過去。特別是新華社的報導，引起黨內外許多人不滿。

我昨天在網上看到北京大學有十幾個研究生、博士生致全國大學生的公開信。他們倡議各高校同學，包括全國的大學生和主張社會正義的人士，清明節到天安門去悼念趙紫陽。我是在網上看到的，當局也會知道。

我們不希望矛盾激化，希望在社會轉型期除了堅持經濟體制改革外，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逐漸有所進展。我對新一屆國家領導原來還是抱有希望的。

二〇〇三年六月我參加了一個民間修改憲法的討論會。這個會是我們馬列所畢業的一位研究生召集的，這個人叫曹思源。

記者：前兩天我剛採訪過他，他被軟禁了。

馮蘭瑞：他說「趙紫陽結束了軟禁，我的軟禁剛開始。」

我是在中國社科院馬列所離休的，曹是我們所第一屆研究生。他在青島召集了修改憲法的一個民間討論會，提了一些建議。他請我去參加這個會，是因為在這以前我寫了一篇文章，建議我國憲法中恢復公民遷徙自由的條文。

我的專業是經濟學，近二十幾年具體研究領域是勞動力市場，特別關注勞動者就業、勞動報酬、社會保障、農村人口進城和城市化等問題。我主張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允許農民進城，城市之間的勞動者也要能流動，因此就要改革戶籍制度，讓公民享有遷徙自由的權利。這就涉及到修改憲法問題。

二〇〇三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前，我以為這次人大會議要討論修憲，因此寫了篇文章提出建議，建議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修憲時，恢復憲法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的條款。一九五四年第一部憲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是有這個條款的。一九七五年修憲，公民的權利減少了很多條，這一條也沒有了。

我主張向農民開放大中小城市。農民向城市轉移不能堵，事實上是堵不了的。現在進城的農民已經有一億多了，在大城市就業的已經有九千多萬了。為了實現城市化、現代化，應該給農民以遷徙自由。

農民進城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大問題。我們國家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一畝多一點，土地資源少，而人口特別多。按照前幾年的計算，農村多餘勞動力差不多有三個億。要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現城市化，勞動者不能流動怎麼能行呢？勞動力流動和公民遷徙自由是社會發展、社會進步的一個必然趨勢。

我的這個建議於二〇〇三年春天託一位人大常委委員朋友送到全國人大，後來人大常委辦公廳給我打了電話，說建議收到了，已經轉到修憲研究組去了，並且告訴我說二〇〇三年人大會議沒有修憲議題，二〇〇四年人大第二次會議才討論修憲。

後來我又寫了一篇文章〈論公民遷徙自由和憲政建設〉。就是說即令憲法吸收了我的意見，寫在紙上，但不實行也沒有用。公民的很多權利都寫在憲法裏面了，但是沒有實行。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只有憲法而無憲政，因此就提出來要進行憲政建設。這篇文章好幾個刊物轉載，當時我認為這個意見好像有希望被接受。但是，二〇〇四年修憲沒有接受這個意見。

我說這些是說明什麼問題呢？就是說像我們這種完全是為了國家法制的建設，希望國家能夠搞好的意見，也不被接受。當然，我提意見是我做為公民的權利，你可以不採納。但是連討論討論，提提建議都不允許，這未免太過分了。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涉及全體公民的權利和利益，為什麼民間不能討論修憲呢？

記者：趙紫陽的告別儀式您去了嗎？

馮蘭瑞：我沒有得到允許去八寶山，我沒有收到通知。我九十歲的老伴收到了通知。我就請工作人員去聯繫，說因為他的年紀大了，需要我跟他一起去，好照顧他。回答說不行。

記者：他們沒有說原因嗎？

馮蘭瑞：只說按規定只准本人去，連隨員都不能帶。我就沒有去了。

記者：也有別人說清明節快到了，「六四」周年也到了，您

看可能會怎麼樣呢？會不會發生一些事情？

馮蘭瑞：我覺得一方面來說，像我們這些老人不會到天安門去搞什麼，但是年青人、學生就很難說，不是已經有人發出倡議了嗎？當然另外還有一些人，比方說拆遷戶、失地的農民、上訪的人，也許會藉機表達一下他們的訴求。實際上，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正如有位朋友的文章說的，什麼都不會發生，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如果真的有人去天安門，我希望政府不要像過去那樣強硬處理，絕不要使用暴力，要理性地、冷靜地、和平地對待。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現在如果再發生十五年前的那種事，在天安門再出那麼大的事，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確實受不了了，再也經受不起這種折騰了。要是再這麼折騰的話，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大紀元二月九日訊）